

内部学习资料
仅供参考 严禁外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中国改革 新征程

北大承泽

参考

2024年10月

制作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制作部门：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目录

中国改革新征程

热点分析

01

- 黄益平：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3
- 卢锋：宏观调控历史演进与供强需弱现实失衡 45
- 杨志勇：财税改革的方向与逻辑 68
- 赵波：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与获得感..... 86

产业观察

106

- 徐晋涛：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几个关键问题..... 108
- 郑林 + 冯游平 + 潘晋：绿色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机遇 .
..... 143

-
- 黄卓：**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时代？ 162
- 宁高宁 + 黄卫伟 + 肖知兴：**变局时代的管理哲学与挑战应对 178
- 杨壮 + 刘世超 + 郎春晖 + 魏然：**变局时代的战略与军事领导力 194

-
- 林毅夫：**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长期优势 218
- 黄益平：**如何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224
- 罗伯特·鲁宾对话黄益平：**美国大选与中美经济关系 239

01.

热点分析

编者按：

2024年年中，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迈上了改革的新征程。

改革新征程上，哪些改革特别值得关注？经济数据背后反映的挑战与机遇是什么？未来中国经济如何发力？如何在保增速、提质量、换动能、促创新与防范系统性风险之间取得平衡？读懂三中全会的《决定》，关键是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改革的重点。



本期我们将结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9期的内容和黄益平老师的一篇专题文章，分享对中国经济的新观察和对中国改革新征程的展望。作者分别是北大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和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赵波。

黄益平：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卢锋：宏观调控历史演进与供强需弱现实失衡

杨志勇：财税改革的方向与逻辑

赵波：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与获得感



黄益平¹：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经常听投资者、企业家抱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力度不足”。最近财政部决定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国内外一些自媒体又纷纷将其解读为政策“放水”“中国版的量化宽松”。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1]。不过这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广义的定义，它包括三个方面的目标，即提升经济增长动能、

1. 黄益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促进社会公正。这三方面目标分别对应着与之匹配的政策工具。本文讨论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一个狭义概念，主要是通过货币和财政的逆周期政策工具，让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促进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实现合理的劳动收入增长和企业盈利增长。

现分享个人对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观察，特意加了“中国特色”几个字，是因为与一般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相比，这个框架确实有一些特别之处。我国的政策框架有特色，主要是因为经济中的一些结构性或体制性的特征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选择、政策传导及其效果产生了影响。但这个讨论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学理论，因为这些特点仍然可以在一般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但可能需要改变或者增加一些限定条件。

除了简单回顾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与

发展，本文还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与传统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我国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二、过去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以雷厉风行、立竿见影著称，为什么近期市场主体普遍感觉政策力度温吞？

三、如果要提升我国逆周期调节的成效，应该对宏观经济政策做什么样的调整？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宏观经济政策是政府为了控制与影响总体经济状况所采取的策略与行动。宏观经济政策有特定目标，一般包括保持经济稳定、实现可持续增长、降低失业率、控制通胀率等，在特定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有时也会包括一些结构与产业的维度，但这种做法并不普遍。

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政府通过改变支出与税收水平来影响经济活动。如果政府增加支出、增加赤字率，实际上就是增加总需求，经济活动会因此变得更活跃。反之，如果政府减少支出，经济活动的速度会放缓。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一般包括管理货币供应量与利率水平。宏观经济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关注总量指标，包括总需求、总供给、总的价格水平和总的失业率水平等等，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结构性的做法。

（一）凯恩斯主义与弗里德曼的批评

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是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逐步形成，在此之前各国政府对于干预经济活动并不是积极主动的。凯恩斯应该是早期宏观经济政策思想最重要的贡献者 [2]，他主要关注的是财政政策。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可以用三句话来

概括：

1. 总需求由私营与公共部门的共同决定。总需求的构成是消费、投资和出口，即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个变量对经济活动水平有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总需求水平由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一起决定，家庭决定消费，企业决定投资，政府决定公共支出。

2. 价格特别是工资对供求关系反应缓慢。

3. 预期中与非预期中的总需求变化短期对产出与就业产生巨大影响。

简言之就是总需求决定总供给，所以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稳定经济活动。当经济下行时，政府通过赤字政策可以提升总需求水平，从而使得经济活动更加活跃。

过去一百年来，凯恩斯主义为各国的

宏观经济政策奠定了学术基础。当然，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也在不断演变。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凯恩斯参加了一个讨论会之后跟人说，在会场的都是凯恩斯主义者，除了他自己。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曾经对很多宏观金融学者产生重要影响。弗里德曼及其合作者发现，在 1929 年到 1933 年大萧条的四年间，美国货币供应量 M2 一直在往下走 [3]。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时，如果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就会雪上加霜，令经济进一步收缩。弗里德曼认为这个数据表明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不作为。

伯南克的学术生涯是从读这本书开始的，他接受两位作者的观点，很可能为他后来作为美联储主席在次贷危机期间采取超常货币政策埋下了学术种子。后来作为美联储理事出席弗里德曼 90 岁生日庆祝活

动的时候，伯南克还特意肯定了弗里德曼之前对美联储的批评。

当然，也有学者解释美联储在大萧条期间没有努力宽松货币政策，是因为受到一些因素的约束，一是当时的社会普遍担心危机之后的道德风险问题，所以美联储即便有能力，也没有扩大货币供应的强大动机。二是古典金本位限定了货币供应量。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各国经济走入大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古典金本位的体制下，货币供应跟不上经济产出的增长，从而形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4]

（二）宏观经济政策规则

灵活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了益处。经济低迷的时候，政府可以提高赤字率，增加公共开支，提升经济活跃度。反之，如果经济过热，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盈余，减少总需求。这

样的逆周期调节可以降低经济波动的幅度、增强经济的稳定性，从而有利于提高福利水平。

货币政策也一样，特别是在 1971 年黄金和美元脱钩以后，许多国家走向浮动汇率，央行掌握了信用货币发行的自主权，这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经济活动活跃的时候，可以扩大货币供应量，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同时，还可以实施逆周期调节，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采取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推动总需求的提高，稳定经济。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变得灵活，为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调节手段。而逆周期调节的一个重要逻辑依据是“稳定可以增加福利”。当然，适当的经济波动也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上行的时候会增加许多新项目，下行的时候一部分质量差的项目就得退出。但如果经

济波动的幅度过大，可能会造成很多浪费，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甚至危及金融稳定。

当然，这种“政策灵活性”的利用也有度的问题，如果利用不当，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财政透支过度和货币超发过度的现象过去都曾经发生过。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以及次贷危机之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就是因为政府没有很好地管理负债而发生了重大的风险事件。

21世纪前十年，津巴布韦爆发恶性通货膨胀，面对国民经济的崩溃，政府没有想着如何积极应对，而是不断地发行钞票，通胀率曾一度超过百分之二十万。一张面值为100万亿元的津巴布韦币，实际价值约40美分，相当于人民币2.5元。这就是缺乏市场纪律的货币供应扩张可能带来的问题，它可以让一个国家的货币体系在短短的几年内崩溃。我国在民国后期也有过因大量发行金圆券而引发恶性通胀的经历。

既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又要避免出现大的风险，怎么办？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就开始探索设置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规则。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对赤字率和公共债务设限。

一般而言，财政赤字不能超过 GDP 的 3%，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不能超过 60%。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吸收新成员的时候就曾以上述两个指标作为重要的评估指标。后来很多国家也开始用这两个指标来衡量财政状况是否健康。在货币政策方面，实行通胀目标制，同时赋予央行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美联储把通胀率目标设定在 2% 左右，我国是 3% 左右，可以接受温和的通胀，但不允许随便超发，保证币值稳定。通胀目标制的一个重要逻辑是，如果货币超发，就容易出现高通胀。因此，只要明确了通胀的目标，就可以在赋予中央银行一定的

政策灵活性的同时，避免发生严重的货币超发事件。

（三）最近的一些新情况

不过，自次贷危机以来，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出现了一些超常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之前所明确的规则，特别是在次贷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率大幅度地超过了 3%、公共债务也远高于 GDP 的 60%。现在除了德国的公共债务与 GDP 之比略高于 80%，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都超过了 100%，日本更是在 200% 以上。

货币政策也一样，在危机与疫情期间，美日欧央行均实施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在将短期政策利率降到零之后，继续采取措施压低中长期市场利率，改变收益率曲线的形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些做法是原来货币政策框架里没有的。对这

些政策实践的批评声音一直存在，主要是认为决策者不负责任地放松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也有专家认为，过去十几年，欧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真正做到了“收放自如”，该放松的时候果断地放，该收紧的时候也毫不迟疑。起码到目前为止，这些超常规的做法还没有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那么，这些新的政策实践究竟是临时性的危机应对还是长期性的规则改变？如果这些突破短期不能及时回归常态，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目前也许还无法对这样的问题给出清晰、权威的回答，可以继续密切地观察一段时期。

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几个特点

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实有不少独特之处。以各货币政策为例，很多国家的央行都有较高度度的

独立性，其中不少实行了显性、隐性的通胀目标制，政策工具主要是短期政策利率。

而我国央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之一，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也更加多样化一些，政策工具既有政策利率，也有数量指标。2016年周小川行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做的康德苏中央银行讲座中，阐释了为什么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与市场经济国家的框架存在差异。如果简单地总结一条，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独特的机制。[5]这可能也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特点的最为关键的因素。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确实有很多独特之处，从政策目标到政策工具，从决策过程到执行方式。但最为突出的特点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非价格、非市场的政策工具

第一个特点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存在一些非价格甚至非市场的政策工具。比如，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短期政策利率，虽然各国央行的调节方式有所差异。我国的政策工具种类更加多样化一些，包括政策利率、数量工具甚至行政手段。即便政策利率也相对复杂，既有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又有短期逆回购利率，短中期同时控制，可能会影响市场上收益率曲线的形状。

不过，最近潘功胜行长已经表示可能要取消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的政策工具功能。另外，货币政策的工具箱中还有一些数量型的工具，最为独特的是“窗口指导”，就是央行官员使用温和的语言传递清晰的政策要求。

之所以出现多样化的复杂的政策工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经济，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利率传导机

制也还不够顺畅。比如一些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不太灵敏，这样就不如用货币供应量甚至信贷规模这样的数量工具，效果更好一些。窗口指导虽然有市场化的成分，但归根到底是行政性手段，在执行过程中更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过去将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作为政策工具，直接影响贷款利率基准目标 LPR，也是因为从短期到中期的利率传导上不够顺畅。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一直在沿着两条主线演变，一是从直接控制到间接调控，二是从数量工具到价格工具。也许将来的货币政策框架会更加接近欧美日的做法，但这个转型尚未完成。一些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也发现，当前是数量规则和价格规则同时发挥作用的混合体。到目前为止，这套调控体系总体是有效的，但在灵敏度、准确性上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二）决策过程中的部门站位

第二个特点是财政与央行的部门站位很清晰，有时影响政策协调。欧美国家过去重视央行的独立性，所以政府只能管财政政策，管不了货币政策。过去十几年间，这个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总体上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决策是分离的。

我国的财政和央行都是政府的组成单位，按说政策协调应该很容易。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并非总是如此。在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经常听到央行官员呼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财政官员则主张更大力度的货币政策。交叉讨论政策选择本身并没有问题，甚至可能是健康的讨论氛围的表现。但也不能排除官员有时候存在部门站位的考虑。传统的政策思维是政策空间要留有余地，特别是如果考虑“为国家管好钱袋子”，对看起来比较激进的政策措施会持保守的立场。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都很

重视“保存政策空间”，以备未来的不时之需。

问题是宏观站位与部门站位有时候是有差别的。部门政策空间的价值在于满足未来调节经济周期的需要，这本身并不错。但如果因为“保存政策空间”而影响了达成“宏观经济稳定”的目的，可能就有点本末倒置的味道了。

因此，“政策稳健”与“经济稳健”之间要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保持“政策稳健”的目的是将来还有支持“经济稳健”的政策空间，不要把弹药一次性打完。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政策偏保守，一旦影响了“经济稳健”，那也就不会再有“政策稳健”。

比如，政府一直非常重视 3% 的财政赤字率的门槛，除了在 2022 年，政府都把赤字率确定在 3% 或以下。但这引发了

两个潜在的问题，一是全世界都知道近年我国广义的财政赤字率远远超过 3%，区别只是因为一大部分开支没有列在狭义的财政开支里面。政府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分别发行了各一万亿元的专项特别国债，这两笔钱都不直接计入财政赤字。但问题是，特别国债分配、使用的门槛比较高，直接影响了财政扩张的实际效果。二是短期不愿扩张太多，看起来是有利于财政政策的健康，但如果经济不活跃，反而有可能提高将来财政状况恶化的概率。

（三）“中央决策、地方行动”

第三个特点是地方政府对宏观调控的放大作用。过去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特色是地方政府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央出政策，地方加油干。以 2008 年宣布的“4 万亿”刺激政策为例，其中由中央承担的支出是 1.13 万亿，但最终实际做到了 30 万亿。这个放大机制主要来自地方政府。

决定地方政府行为的是两个机制。一个是所谓的“GDP 锦标赛”。有许多学术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的 GDP 增长速度越快，该地区领导被提拔的可能性越高，后来有学者称之为“GDP 选美”。二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与城投公司、融资平台等获得了许多资源。1994 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的财政能力受到了挤压，因而出现了事权和财权不匹配的现象。但很快地方政府就创造性地找到了许多新的财源，包括出让土地和平台融资。

这两个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放大器，特别是在放松的时候。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次贷危机期间，地方政府对于放大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和稳定宏观经济均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放大作用也不完全是对称的，比如在中央政府决定实行扩张型

宏观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的放大作用就比较显著。

但在中央政府决定实行紧缩型宏观政策的时候，地方政府的放大作用就不太显著。当然，这种放大作用也会有后遗症，在“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僵尸企业、房地产泡沫、金融低效、通胀压力等等。有些问题到现在仍然还在消化，这可能是很多官员对过度的刺激政策心存疑虑的原因，决策层甚至开始关注跨周期调节。

三、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挑战

在 1949-1978 年，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的体制。1978 年后，形成各种类型的“财政包干”，“利改税”改变了财政收入来源，“分权让利”增加了地方政府自主支配的财力。1994 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但财政收入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

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和各种收费、罚款收入等，形成了土地财政模式。2008年后，地方融资平台长足发展。地方政府想各种办法借钱，但最后承担责任的可能不是地方政府。[6]

美国的市政府、州政府如果无法偿还债务就只好申请破产，自己承担后果。我国的体制和美国不一样，不可能让市政府、省政府破产，因而最终责任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担。

从2018年起，我国的地方财政实行“开前门、关后门”的改革政策，限制地方债务总量。这些年来，一方面限制地方政府融资，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不太稳健，土地财政难以为继。尤其新冠疫情以后，大部分地区的财政捉襟见肘。传统的宏观调控框架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一）过于温和的宏观经济政策

2022 年底新冠疫情终结，我国的经济
发展进入了后疫情时期。出口、投资和消
费都呈现了一定程度的复苏，但总体来说
经济增长的力度还是不太强劲。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资产负债表的收缩。三
年新冠疫情期间，家户消耗了大量以前积
累的储蓄，企业则增加了不少负债。与欧
美国家政府的做法不太一样，我国政府在
疫情期间没有采取给家户和企业发放现金
补贴的做法。这意味着当疫情结束的时候，
我国家户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受到很
大程度的挤压。疫情后房地产市场再度出
现较大震荡，令家户的资产负债表进一步
收缩。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总需
求偏弱就比较容易理解。

按理说，总需求偏弱的时候，宏观经
济政策应该发挥扩张的作用。事实上，在
2023 年初和 2024 年初，政府都决定当
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基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后来央行官员将“稳健的货币政策”进一步界定为“支持型”（accommodative）货币政策。但实际情况是，在那两年间，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的力度一直低于市场主体的预期。2023年全年广义的财政支出仅增长1.3%，而支出扣除收入后的净支出下降了1.3%。货币政策利率虽然经历了几次小幅的下调，但因为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大，实际利率有所抬升。总体看，宏观经济政策尚未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的疲软态势。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力度偏小，这看起来多少有点奇怪。过去几十年，我国政府宏观政策都是以雷厉风行、立竿见影著称的。近年偏温和政策的背后，可能有一系列原因。有官员曾经比较清晰地描述了宏观经济格局的变化，即从过去的“易热难冷”过渡到了现在的“易冷难热”，这是因为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包括

消费、出口甚至投资在内的总需求不再像之前那么强劲。这实际上就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不过宏观政策力度偏弱，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解读。

1. 以往刺激政策取得很好的效果，但也产生不少副作用，比如高杠杆、低效率、资产泡沫等，这使得一些人对采取力度极大的刺激政策持保留态度。这是正常现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2. GDP 增长率在 5% 左右，也许在有些官员的眼中，经济形势可能没有很多人担心的那么糟糕？美联储采取超常的量化宽松政策，第一次是全球危机时期，第二次是新冠疫情时期，都是在面临危机时采取激烈措施。我国现在 GDP 增长速度保持在 5% 左右，采取激烈的刺激政策的必

要性，确实是可以讨论的。

3. 宏观政策擅长于支持供给，不擅长支持消费。当前我国经济已经面临较为严峻的过剩产能的挑战，进一步的刺激政策很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

4. 因为我国政府的行政动员能力很强，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放易收难，决策部门因而采取相对审慎的态度。这些理由听起来都是有道理的，但这些理由都是有特定的背景和条件的，如果那些背景和条件发生了改变，那可能就需要调整决策的思路。

（二）宏观政策管理市场预期的功能

近年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是地方政府开始缺席宏观经济调控。过去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行动，中央、地方齐心协力调控经济，效果非常好。行政动员能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积极作为。但现在地方政府因为财政能力匮乏和市场纪律约束，

无法再对宏观经济政策发挥放大作用。

2023年、2024年，中央政府都表明要支持经济增长，但实际政策效果一直非常有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帮着扩张，实际上做了很多紧缩的事情，比如“查税30年”、渲染“过紧日子”。有意思的是，地方财政困难众所周知，但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却鲜有提及。这意味着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需要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改变总需求有两个机制，一个机制是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直接增加或减少总需求。比如修建铁路、公路、机场，对水泥、钢铁的需求增加，经济活跃了，总需求就增加了。

另外一个重要机制是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比如“4万亿”刺激政策宣布以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地方政府、金融机

构都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一定要足够大，让市场参与者认为经济将发生方向的转变。如果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政策力度不足，就很难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与行为，政策效果就会事倍功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专门研究金融市场，他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投资者市场是非理性的，情绪起很大作用。2013年席勒出版了《叙事经济学》一书，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可信、有说服力的叙事方式，就可以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朝着叙事的方向前进。叙事经济学其实是一种心理学甚至艺术，要让大家真诚地相信，强迫是不行的。当然，有影响力的“叙事”有时候不见得是合理、理性的，所以也很容易造成泡沫和风险。

2009年年初，国际市场的铜价突然暴

涨。一开始大家并不理解背后的原因，因为铜市场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供求失衡。后来经调查才发现，中国宣布“4万亿”刺激政策之后，铜价开始上涨。主要是因为刺激政策中有一个重要项目，即更新国家的电网系统。电网系统使用大量的铜，因此，“4万亿”刺激政策一经宣布，国际铜价就开始上涨了。

（三）低增长风险还是低通胀风险

2024年一季度的我国GDP增长达到5.3%，达到了全年5%左右的增长目标。那为什么市场主体的感知却相去甚远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价格下降。一季度GDP平减指数为-1.1%，这意味着名义GDP增长只有4.2%。而后者与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直接相关，这说明，价格水平的变化对市场主体的感知有很重要的影响。

从2023年四季度到2024年1月，

我国的CPI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1月以来的增速也只是略高于0%。大多数专家与官员预测2024年全年CPI增速会低于1%。

上涨的原因有两个：

1. 猪肉价格上涨。猪肉价格高会刺激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增加，供给增加造成肉价下跌，肉价下跌到很低则打击了农民积极性，造成供给短缺，供给短缺又使得肉价上涨，周而复始，就形成所谓的“猪循环”。“猪循环”的周期一般是18个月，现在由于饲养得更快，周期有所缩短，但是这个周期仍然存在。

2. 石油能源价格上涨。如果只有这两个因素，总体来说产能过剩的压力很大，价格还是很疲软，扣除食品与能源的核心通胀仍然会处于非常低的水平。

被称为日本物价研究第一人的东京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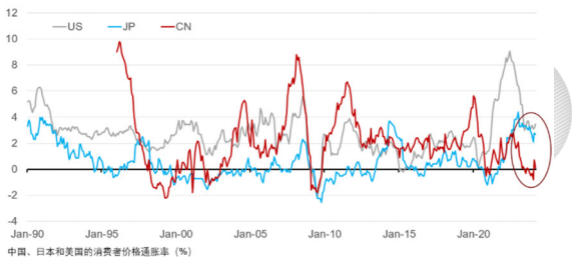
学渡边努教授认为价格非常重要，但最关键的是价格预期。如果价格不涨，老百姓会推迟消费，厂家因为无法提高生产者价格，因此不加工资也不多雇人，企业盈利没有改善，投资者当然不会增加投资。这样就相当于形成了消费者 - 生产者 - 投资者之间一个预期的恶性循环。渡边努认为日本失去的 30 年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结果。古典金本位因为货币供应量跟不上经济增长速度而造成通货紧缩，实质上也是上述预期恶性循环的结果。

渡边努发现，自 2022 年起，日本开始走出这个恶性循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是日本消费者开始接受价格上涨。根据他对消费者的调查，过去消费者去超市，如果看到价格上涨，一般都不会继续购买，而是到其他超市寻找没有涨价的商品。但从 2022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接受涨价。

当然促成日本价格上涨的因素很多，比如国内产出缺口收窄和俄乌冲突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过去三十几年，日本的CPI一直在0%左右徘徊，在2022年突然上涨到4%，之后回落到略高于2%，这个水平与多数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借用渡边努的叙事体系，日本已经开始走入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预期的良性循环。

值得警惕的是，我国会不会走入“低通胀陷阱”？我国的PPI已经经历了20个月的负增长，CPI也一直十分低迷。更重要的是，经济中尚存在一系列收缩性的机制，包括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造成的需求减弱以及在钢铁、氧化铝、新能源等领域的过剩产能增加。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参照系，如果说日本的通货膨胀率正从过去多年的“例外”走向“趋同”，通胀率保持在和欧美国家大致相同的水平（图二）。我国的通货膨胀率有没有可能步日

本的后尘，成为新的“例外”？价格水平的例外，同样也可能造成经济活动的低迷，因而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图二，中国、日本和美国的消费者价格通胀率（%）

（四）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

日本经济专家辜朝明曾经在分析日本20世纪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的后果时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概念，他的主要发现是，当时企业已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债务最小化。这一行为的变化可能导致全面性的经济衰退，甚至令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无能为力，这个时候最为重要的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近年也经

常听到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争论。这里不打算介入那个讨论，但值得借鉴的是，一旦资产负债表开始全面萎缩，将很难维持经济活动的稳定。而当前我国家户、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三张资产负债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方面，房地产价格下行使得家户资产缩水，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承压。另一方面，去杠杆或稳杠杆的要求也使得地方政府无法有效支持经济活动的扩张。如果资产负债表稳不住，经济活动就很难真正稳住。在辜朝明看来，这个时候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当市场上优质的借款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政府就应该发挥最终借款人的功能。

四、改进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过去几十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雷厉风行，其决策速度、执行成效，经常令

国际市场参与者惊叹。但最近这几年，虽然政府依然十分重视宏观经济调节，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市场主体普遍感受政策力度不如以往。这本身可能不是什么问题，但市场预期迟迟不能得到改善，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归根到底，经济行为就是由市场预期决定的。

（一）两种流行的观点

在政策讨论中经常听到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强调，结构性改革远比宏观刺激重要。这个观点当然是对的，毕竟只有改善经济效率、提升总要素生产率，经济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我在过去很长时期也赞同这样的观点，还在2008年写了短评文章“GDP增长低于8%，天不会塌下来”，主要论点是增长的质量比增长的数量更重要，不要把“保八”当作宗教一般的理念。但这个看法并

不否定宏观经济政策重要性。如果说结构性改革是长期性举措，宏观政策则是短期性应对，两者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短期内经济垮了，可持续增长也就无从谈起。有专家认为现在企业家信心不足，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解决，宏观刺激至多也就是拖延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问题是，结构性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见效更需要时日。重要的是先把经济态势稳住，而这正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

第二个观点认为，欧美的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宽松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害人害己。2008年前，由于核心通胀一直非常稳定，美联储长期维持十分宽松的货币政策。短期看，当时的增长很强劲、就业也很充分，但最终引发了祸及全球的次贷危机。在次贷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欧美各国非常果断地采取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

策举措，有效地稳定了经济与金融条件。危机结束之后，又迅速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后果。起码从“逆周期”调节的角度看，这段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

欧洲央行原行长德拉吉曾经说过，欧洲是主要依靠货币政策，而日本在很长时期主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只有美国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所以，相比较而言，美国的经济表现最好。至于之后欧美经济是否会出现严重的“跨周期”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二）问题与改进的方向

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应该回归到周期定位，即管理经济周期。前面已经讨论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令宏观经济政策成效打了折扣。

1. 跨周期调节的视角可能削弱了逆周

期调节的效果。跨周期调节的提出，有合理性，也是基于过去已经发生的问题提出的应对，因而也具有很强的理论创新性。但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之间的协调，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能因为担心跨周期问题而放弃逆周期调节。

2. 财务状况紧张使得地方政府缺席近年的宏观经济调节。这可能是最近宏观刺激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客观地说，地方政府减少参与宏观经济调节，不一定是坏事情，将来地方政府可以回归狭义的政府功能。但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要承担更大的宏观政策责任。

3. 因为过度重视政策稳健而影响了对经济稳健目标的追求。政策工具的稳健是表，宏观经济的稳健才是本。以财政政策为例，在经济疲软的时候，财政赤字率提升到3%以上，表面看是降低了财政政策的健康度，但如果财政刺激政策最终稳住

了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空间一定会变得更大。如果经济稳不住，财政政策空间也就无从谈起。

4. 行业政策调整影响了宏观经济稳定。前几年的专项整治政策，针对的房地产、金融、教培、平台经济等都是最活跃的经济部门，现在专项整治已经结束，但市场尚未感受到监管政策环境的宽松。专项整治是行业性政策，但客观上产生了紧缩的宏观效果。

我国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政策调整，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1. 重视对市场预期的引导。直接增减总需求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功能，更为重要的是改变市场预期。如果企业家、投资者、消费者的预期改变了，宏观调控措施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改变预期，首先要求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力度，给市场情

绪足够大的冲击。同时也要关注“叙事经济学”的作用，如果整天渲染“过紧日子”、降薪、补税，市场主体不可能对未来变得更加乐观。

2. 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责任。过去地方政府有意愿、有能力、有资源，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很容易被放大，但现在基于多方面的原因，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再继续发挥那样的作用，这意味着如果中央政府要刺激经济活动，就必须有足够大规模的财政开支，预算必须做足，而且要能够落得下去。

3. 对“逆周期调节”的关注要放在“跨周期调节”的前面。如果因为担忧将来出现跨周期的副作用而减弱了逆周期调节，那宏观经济政策也相当于自废武功了。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采取配套措施缓解这样的矛盾，比如过去的刺激政策容易造成类似于泡沫、杠杆、效率等方面的副作用，一

个原因是刺激过度，现在这个风险已经减小。另一个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放易收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该收的时候财政与央行很难收回来，这就要靠进一步的结构性改革，强化市场纪律。

4. 加强财政、货币与行业政策之间的协调。过去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大，现在党中央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应该更有可能做到不同的政策之间相互配合、劲往一处使。

（三）三点短期的政策建议

最后提几点短期的政策建议供参考。

1. 应把追求温和通胀的重要性提高到与追求中速增长一样的地位。每年的“两会”都会宣布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目标，但政府对前者是严肃的，对后者却并不那么认真。现在经济“易冷难热”，如果真的陷入“低通胀陷阱”，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建议将 CPI 增长 2%-3% 明确为刚性政策目标。

2. 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特别是尽快把已经安排好的财政开支落实下去。2023 年广义的财政开支远远滞后于年初的计划，目前看今年仍然是如此。应该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理念，理直气壮地采取支持消费增长的财政手段，包括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和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3. 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修补脆弱点，降低资产负债表风险。当前经济疲软，背后有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缺乏订单、信心不足和资产负债表收缩。当前家户、企业、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都面临较大的压力，如果不能及时止住恶化的趋势，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可以考虑更好地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由中央政府承担一定的责任，稳定市场，稳定信心。

注释：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 [2]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原版出版于1936年）。
- [3]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原版出版于1963年）。
- [4] 伯南克，《伯南克论大萧条：经济的衰退与复苏》，中信出版社，2022年。
- [5] Zhou Xiaochuan, "Michel Camdessus Central Banking Lecture - Managing Multi-Objective Monetary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itioning Chinese Econom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June 24, 2024.
- [6] 楼继伟，《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再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

卢锋²：宏观调控历史演进与供强需弱现实失衡

改革时代的几次三中全会有关全面改革决定，提供了回顾和认识我国经济体制与宏观调控范式提出与发展的权威历史文献。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46年间，中共一共召开10届三中全会，其中4届主题涉及部门性改革与紧急形势下宏观政策调整部署，其余6届都针对不同阶段的全面改革议题进行决策，记录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实践与认识历程，而宏观调控命题的提出与定位构成新体制建构与发展的重要主题之一。从这个角度观察，最新三中全会改革决定聚焦“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方针表述。

2. 卢锋：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校友学院发展基金讲席教授。

我国体制转型与谋划改革的根本特点与成功经验，是遵循实事求是与问题导向原则，从现实经济矛盾与既有体制背景条件出发，探索体制改革方向与政策调整路径。宏观调控概念的提出和演变，更是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形势特点与政策实践面临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近年我国经济运行大势，呈现供给能力较强与需求增长偏弱的总量不平衡矛盾关系，折射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积极因素与制约条件，客观上需要通过实施宏调与深化改革相结合的应对措施推进经济再平衡。

就此谈两点：首先简略回顾改革时代宏观调控概念提出与演进过程，观察认识最新改革决定有关宏调政策方针的新表述及影响。接着观察近年经济运行供强需弱的不平衡态势，从历史比较角度讨论新型失衡特点及再平衡政策要求。

一、“宏观调控”的提出、发展与新表述

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宏观调控一说，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宏观调控”，其概念的酝酿、提出与丰富完善，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变过程，并在多次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得到凝练而权威的呈现。这方面情况为学习和理解最新改革决定有关新命题提供了必要背景。

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运行必然也会涉及宏观层面关系：如经济增速是否合理、结构比例是否协调、货币发行是否适度等，在这个意义上当时国民经济管理自然也包含今天通常所指的宏调内涵。然而与当时经济内外环境与制度安排相适应，计划时期另有一整套经济理论和概念支持的政策分析语境，学界和决策部门一般不采用宏观经济或宏观政策等现代经济学概念。当时国家及政府部门作为计划制定和

执行的全权主体，不分微观或宏观地全面管控国民经济，也不存在提出宏观经济政策概念的逻辑和现实依据。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情况很快发生改变。作为改革初期体制转型的重要举措，国家在多个经济领域放松行政管制，不同程度赋予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微观决策权，政府退出微观层面直接管控的改革前景逐步趋于明朗。在改革时代新的体制环境下，国家应该采用什么新的方式介入和管理经济，作为一个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提到学界和决策部门面前。

例如 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详细论述了这方面问题。该决定第六部分聚焦“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其中总结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控制经济的经验教训，指出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

并根据实践经验提出政府管理经济的多方面职能，包括制定发展战略和计划、部署基础设施和基本产业重点工程、掌握和运用经济调节手段等等。不过有关论述并未采用“宏观调控”概念。这个事例也表明，我国经济体制探索选择绝非简单依据学理逻辑设计，而是从发展实践所面临现实矛盾入手，通过本源性分析科学审慎地评估选择。

体制转型重大进展，往往受到历史关键时点看似偶然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官方确定“宏观调控”概念，直接背景是1988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形势：面对局部商品抢购与银行挤兑的通胀失控风险，中央在1988年9月30日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果断决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着力压缩社会总需求和抑制通货膨胀。同时强调“治理经济环境，

整顿经济秩序，必须同加强和改善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开始明确采用宏观调控这个重要政策方针概念。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标时确立两个相互联系的命题：一是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十四大政治报告对上述两点的表述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其中宏观调控甚至在文本形式上对市场配置资源具有前置地位。这从一个角度显示，当时决策层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上作出突破性决策同时，用突出“宏观调控”来显示对体制转轨可能出现的波折风险，具有谋而后定的心理准备与应对方针。

此后历次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无不结合体制转型实践经验创新诠释宏观调控方针定位与主要任务。1993年十四届

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对相关方针更为从容地表述为“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规定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等。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提出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求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新方针，强调“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其主要任务仍包含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等。

二十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延续了十一年前三中全会有关“科学的宏观调控”的方针，然而具体内容论述显示多方面变化。一是第五部分中心词成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早先“宏观（经济）调

控体系”提升为“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二是凸显“国家战略规划”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作用，要求“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与十一年前宏观调控“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方针比较，“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在实施层面的整合作用显著增大。三是没有像早先几次改革决定那样，在文本上直接阐述宏观调控的方针定位与主要任务；不过决定第五部分有关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条文，不少内容体现了针对目前现实经济问题的用意。

这次虽在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第一次采用宏观经济治理的表述，不过此概念近年早已提出。2020年5月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提出“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一）构建有效协调的宏观调控新机制。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为主要手段，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2021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促进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内外均衡。”2022年10月二十大政治报告中，要求“健全宏

观经济治理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

对此有两点观察。第一，决定要求“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市场要理解宏观调控部门运作规则和机制，或许要更加系统了解国家规划和重大战略内容，理解更为长期的规划和战略与通常认为针对短期形势的宏观政策存在什么联系，这对需要关注政策动向的市场分析人士显然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要求。另外宏观调控部门要最大化实现政策意图，也需重视与市场 and 公众的有效沟通，使其充分理解宏观调控政策内在逻辑与预期效果。早先宏观调控逐步形成一套政策逻辑，现在把宏观调控提升为宏观治理，宏观调控实施要“围绕”

国家规划和重大战略，有关部门或需更清晰地阐述新的宏调机制，帮助市场和公众更准确理解，才能使宏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从十四大确立宏观调控命题以来，历次有关全面改革的三中全会决定，都包含有关宏观调控定位及其保持总量平衡等目标的论述。或许是2021年制定的十四五和远景目标纲要对此已有表述，或许是考虑目前宏观经济运行较为平稳，这次《决定》没有直接和正面阐述宏观调控的职能和任务，在30余年多次三中全会全面改革决定中第一次这样处理。不过《决定》明确坚持“科学的宏观调控”表述，财政和金融等部门改革措施多方面涉及宏调内容，另外近年宏调仍体现逆周期调节和谋求总量平衡的政策意图，可见近年决策层强调宏观经济治理，并不意味着放弃早先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几十年来我国在市场化取向改革实践中提出并不断改进完善宏观调控，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总量平衡、逆周期调节、长期与短期关系、总量与结构关系、价格工具与数量工具关系等等，对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积累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近年根据新时期经济内外环境变化，提出了宏观经济治理、宏观调控制度、跨周期调节、围绕规划和战略实施宏观政策等新命题新方针，体现了创新谋变取向。如何把理论和概念创新与解决宏观经济运行面临新问题结合起来，在应对化解现实矛盾中检验和发展宏调新范式，是目前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面临的重要议题。

二、关注经济供需强弱新型失衡

近年我国经济保持韧性增长态势的同时，逐步呈现一种以供强需弱为特点的新

的总量与结构不平衡，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明显制约和困扰。需关注经济供需强弱新型失衡的特点和影响，针对其特殊成因把必要宏调和改革结合起来进行有效治理以推动经济再平衡。下面在简略观察供强需弱失衡现象基础上，结合历史上几次需求不足情况考察其特征，并分析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性。

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一个全局性特点，就是供给能力较为强劲与需求增长相对弱势并存的格局。得益于改革开放构建的市场经济体制与配套政策环境的支撑作用，我国经济供给端总体仍保持活跃的产业升级态势以及对市场信号响应能力，在基建、传统及新兴部门都保持活跃产业升级态势与比较充裕产能。总供给特别是工业制造供给能力较强，显示经济发展潜力与积极前景。然而需求端近年持续偏弱，经济下行压力挥之不去，派

生通胀物价走低、经济追赶放缓、青年失业增压、金融风险频发等；这些问题与信心不足与预期转弱形成互动，使得经济内部某些结构性矛盾呈现复杂化趋势。

决策层从 2018 年以来在每年评估宏观经济的关键节点，不断提示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和需求不足问题，并采取多方面逆周期宏观调控措施应对。近年货币、财政、基建等宏观政策工具频频发力，对稳定经济增长也实际产生积极影响，然而由于近年供强需弱失衡原因超出狭义宏观政策范畴的某些深层结构性因素，宏观调控未能根本扭转近年不平衡格局。下面从改革时代发生的几次总需求不足情况的历史比较角度，探讨近年供强需弱代表的新宏观失衡现象及其成因。

改革时代前 30 多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国宏观经济通常面临信贷和投资扩张压力，受到经济偏热与通胀困扰，然而宏观经济

运行也面临过几次总需求不足情况。第一次发生在改革初年。针对 1978 年前后经济扩张政策加剧经济比例失调问题，1979 年中央实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紧缩政策对经济再平衡产生积极效果同时，也伴随 1980-1981 年出现需求偏弱情况，尤其是 1981 年经济增速降到 5.1% 低位显示过度紧缩征兆。1982 年改革深化并退出紧缩政策，迎来 80 年代中期多年高增长。

第二次是 80 年代末需求不足经济衰退。80 年代前中期经济强劲扩张派生经济过热和通胀压力，显著通胀数年发酵演变为 1988 年抢购与挤兑风潮危机，高层果断实施严厉紧缩措施，叠加随后特殊政治环境因素，1989-1990 年前后经济明显面临总需求不足困难，1989 和 1990 年经济增速分别回落到 4.2% 和 3.9%，大幅低于改革时代潜在增速。1990 年以后宏观政策

逐步趋于放松，特别是得益于邓小平 1992 年南方谈话推动改革突破，1992 年经济进入多年超高增长期。

第三次是世纪之交内外部多重冲击导致总需求疲软与通货紧缩。对 90 年代中期严重通胀的紧缩治理措施伴随某种超调效应，大规模国企改革对劳动力市场派生失业压力，东亚金融危机冲击造成出口困难，内外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改革时期最严峻的总需求不足困难，经济低增长和通缩压力前后延续 4-5 年。面临困难形势决策层坚持推进改革和入世开放，宏调方面实施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经多年调整迎来新世纪初的开放经济景气繁荣。

第四次是 2008 年底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导致我国出口一度急剧收缩，伴随沿海地区外向经济部门就业形势短期显著恶化，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显著风险。然而当时国际环境有利于大国合作应对危机，国

内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到 2009 年 2 季度经济已快速复苏并于下半年再回高增长轨道。这次总需求不足持续时间较短，主要表现在 2008 年 4 季度和 2009 年 1 季度，从年度数据中几乎看不出来。

与上述几次比较，近年供强需弱失衡有几方面特点。一是延续时间较长。早先总需求不足以世纪之交那次最长，2008—2009 年那次最短，四次总共大约 11 年前后，平均每次或不及 3 年。这次在 2018 年呈现需求偏弱伴随增长动力不足最初动向，疫情期多重冲击重创需求增长，疫情后经济复苏仍未能摆脱需求不足困扰，可见其前后已延续 6—7 年，显著超过早先总需求不足平均延续时间。需求偏弱失衡延续时间较长，经济低景气度与预期偏弱信心不足之间的相互影响加剧，导致多方面经济矛盾关系趋于复杂化。

二是除了疫情期特殊情况近年需求不

足伴随经济波动的幅度有限。上述前三次总需求不足时，经济增速都显著低于当时潜在增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两次需求收缩伴随经济大幅波动，90年代政府部门宏观调控能力提升使得经济波幅趋于收敛。近年疫情期经济剧烈波动，然而疫情前后或非疫情期需求偏弱并未伴随经济大幅起落。这显示目前总需求偏弱较大程度与发展新阶段深层结构矛盾逐步释放有关，也得益于宏观调控和调控能力提升对冲需求不足的影响。经济波幅趋缓是积极现象，不过客观上也增加了认识和重视新一轮失衡的困难。

三是近年供强需弱失衡和内需不足的结构特点更加突出。首先，近年内外多方面因素推动我国出口增长较快迈上新台阶，总体而言近年外需增长对我国总需求增长的平均贡献度较高。数据显示，2010—2018年我国净出口对总需求贡献率为负

数，2019 至今平均为正的两位数，显示总需求持续不足总体看不是由外需走低导致，而主要由于内需不足。

其次分别从内需两块基本内容投资和消费看，投资在疫情冲击下经历了一次性剧烈波动，纵观其近年表现制造业和基建投资较好增长，投资减速主要是房地产开发部门由于部门政策调整引入投资持续收缩。房地产部门萎缩影响其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环节，成为近年经济国内循环最明显的堵点之一。

如果说房地产投资下行对内需拖累与特定政策环境变化相联系，影响本轮需求偏弱的消费不足问题则存在更为深层的体制与经济根源。从国际比较数据看，我国人均 GDP 与世界平均水平接近，比 G20 新兴经济体高出近三分之一，但是国民储蓄率与消费率则分别较大幅偏高与偏低，居民消费率也很低。虽然考虑“实物社会

转移”因素后我国居民消费率显著调升，然而该指标调整后仍较大幅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低于 G20 新兴经济体平均水平。

与上述数据相一致，我国消费、GDP、投资全球占比存在较大差距。与世纪之交内需疲软时消费不足比较，目前消费不振原因更为复杂，居民消费不足显然存在体制和体制根源。例如从三类公民的每年人均养老金来看，其间巨大差别凸显体制内外、城乡之间的反差，一定程度上与公共财政转型滞后存在关联。居民消费不足的另外一点重要原因，是我国公共部门掌控大量资源，其较大比例长期通过不同管道持续投资于提高经济的供给侧能力，用于支持居民收入增长与居民消费提升的比例则相对不足。

最后，供给端走强、制造业升级与国内吸收不足，推高外贸竞争力与顺差规模，伴随外部经贸关系出现新矛盾。尤其是我

国电动汽车等“新三样”出口大幅飙升，很快引发美西方国家贸易保护措施。美国以产能过剩为题发难，决定对我国电动汽车额外加征 100% 关税。欧盟则在去年 10 月对我电动车进口发起反补贴调查，并从 7 月 4 日开始临时加征关税。美欧上述政策反映其保护主义错误倾向，客观原因则是我新一轮出口顺差结构特点与美欧在经贸领域形成新的竞争关系，对绿色转型具有战略意义的新三样出口飙升更使美欧倍感纠结。另外美西方对我整体战略演变和竞争博弈动机放大，也产生推波助澜作用。

三、小结

总体看，上述供强需弱格局是一种矛盾或辩证现象：其中“供强”是我国经济增长特别是制造业等产业升级的令人鼓舞现象，“需弱”则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内外多方面环境和体制因素派生的不利因

素；然而这里的一正一负因素并不能自然地相互抵消中和，而是组合匹配形成经济总量与结构层面的失衡关系与问题。与改革时期早先几次总需求不足比较，近年供强需弱失衡呈现多重新特点，正在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充分释放与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性因素之一。纵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宏观调控的提出和发展是体制转型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的重要主题之一，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与结构合理则是宏调的基本目标之一。新改革决定突出“国家战略和规划”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引领作用，显示宏调决策思维的调整创新。考虑充分释放增长潜力实现两步走现代化目标，是执政党制定的顶层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概念又具有超出短期宏调的广阔视角，后续需在最新改革决定引领下，针对供强需弱的现实矛盾加大积极宏调政策实施力度，同时“以

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对症下药推进宏观经济再平衡。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杨志勇³：财税改革的方向与逻辑

财税的角色定位

自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公布以来，财税改革的诸多细节逐渐展现在公众面前。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相比，本次改革在表述和结构上多有新意。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财税改革作为独立章节，用了 900 多字篇幅；而此次财税改革融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框架内，作为四大要点之一，其篇幅也有 800 字，足见其重要性。

3.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财税改革，作为一场系统性的变革，主要内容包括预算、税制以及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要深入探讨其意义，我们首先需要准确理解财税改革本身，进而分析其在推动国家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方面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

从更深层次来看，当前财税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旨在建立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契合的现代财政制度，这一制度不仅是对既有财政制度的优化升级，更是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

回顾十八届三中全会，财政被赋予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定位，它不只是涉及经济领域，而是广泛渗透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层面。在学科设置上，尽管财政学目前仍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存在，但其在财政学界内争取成为独立一级学科的呼声高涨，这背后反映了财政学科独特的研究价值和

实践意义。

财税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然而，财税领域的特殊性在于其包含大量专业名词，这些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承载着不同的内涵，若不了解其背后的变迁，仅凭数据替代或表面理解，极易导致误解。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财政被赋予了新的历史定位——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定位不仅凸显财政的重要性，也强调其与国家治理的紧密联系。这一高层次的定位，为后续的财税改革指明了方向，即改革应聚焦于缩小现状与这一定位之间的差距。

进一步的改革方向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财税改革未作为独立部分列出，但这不减少其重要性，它既是健全宏观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前，面对财税领域的挑战，人们往往寄望于通过改革来寻求解决之道。然而，改革的核心在于体制性和制度性的变革，这类变革往往需要从中长期视角来审视和推进。具体而言，面对眼前的问题，我们或许需要采取短期或超常规的措施予以应对，但改革的本质在于财政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同时，财政政策的实施也离不开财税改革的支撑。以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为例，自2008年以来，其持续性和影响力已远远超出了短期政策的范畴。因此，财税改革不仅是财政制度本身的完善，更是为财政政策的长期有效实施提供坚实的体制保障。

在深入解读本次三中全会《决定》时，不难发现财税改革并非仅仅局限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某一环节，而是贯穿于多个关键部分，具体包括第3、4、7、

11、12 等章节。这些章节均从不同维度触及了财税改革的核心内容。

首先，关于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决定》强调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的重要性。合理的税收负担无疑对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这一问题在税制改革的微观层面亦有所体现。

其次，在全面创新领域，《决定》提出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的分配、管理和使用机制，并健全相关管理体制，同时扩大财政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的实施范围。这凸显了财政管理和专业管理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财政管理工作性正不断得到强调，而科研经费的管理涉及诸多细节，这已经不能仅用经济学视角来分析，还需要会计学分析视角。

再者，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中同样强

调了财税政策的协同作用，特别是在绿色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等方面，税收被赋予重要的调节功能。

此外，民生保障机制的健全也离不开税收的支持，包括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在内的综合施策共同构成了民生改善的重要基石。

在社会广泛关注的房地产领域，《决定》提出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并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的要求。这里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应理解为涵盖房地产相关各类税种的全面体系，而非单指某一税种。

在人口政策方面，《决定》提出了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的措施，特别是专项附加扣除的灵活性与标准提升问题。尽管从财政学理论上讲，“抵扣”更多指的是税收之间的抵消，但实际操作中往往体现为对特定支出的税前扣除，即专项附加

扣除制度的优化。

最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方面，《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行水资源费改税，并强调了绿色税制的重要性。这些改革举措不仅体现了财税政策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积极作用，也为未来财税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指明了方向。

在探讨当前财政制度时，我着重讨论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问题。这一方向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便已明确，尽管历经探索与实践，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已取得显著成就，但改革之路远未终结，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仍需持续深化与推进。

在此，我提出几点关于现代财政制度的理解与研究心得，并简要梳理了相关概念。

本次改革不仅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一脉相承，也紧密契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其核心领域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尽管具体表述有所差异，但改革的延续性和深化方向清晰可见。值得注意的是，财税改革领域的专业性较强，理解上易产生偏差，导致误导。因此，在推进改革时，需明确财政的职能边界，避免强其所难，确保改革措施科学有效。

预算改革

关于预算改革，我分以下三点进行阐述：

第一，健全预算制度，强化财政资源与预算的统筹安排。这要求将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以及国有资源资产所获得的全部收入，无一例外地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范畴。我们长期倡导的“全口径预算管理”理念，正是旨在实现政府所有收支活动的全面预算管理。

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前预算体系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如与政府信用相关的收入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往往源于预算管理的不完善与收入项目的遗漏。隐性债务之所以成为讨论热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预算管理的缺失，未能将这些债务有效纳入监管视野。针对国有资产资产所产生的收入，也必须确保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第二，加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特别是强化事前功能评估，对于提升政府资金使用效益至关重要。虽然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独特性，难以直接比较，但地方政府间仍可通过绩效评估来相互借鉴，促进服务质量的提升。然而，绩效评估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成本差异、指标体系的不一致性、目标设定的难度、评估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第三方评估的参与机制等。相较于事中和事后评估，事前评估更能从

源头上控制成本，实现真正的资源节约。

第三，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这一议题备受关注。在企业界，零基预算管理相对较为顺畅，然而，在政府部门推行零基预算却面临重重挑战，成功案例寥寥。尽管当前部分地区正积极推进此项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背后的努力与艰辛值得肯定，每一点进展都显得尤为艰难和宝贵，因为传统预算编制方式根深蒂固：单位若今年预算为 1000 万，明年编制时往往以此为基准，即便项目有所变动，也想确保总额不低于往期，随后再根据项目需求进行分配。这种做法往往导致资金与项目不匹配，出现资金闲置或项目资金不足的情况。零基预算则彻底颠覆了这一模式，它要求从零开始，对每个项目重新评估其必要性和预算需求，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早在 2000 年左右，我国便已开始探索零基预算改革，但受限于观念转变的难

度，进展缓慢。如今，将“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明确写入三中全会决定，不仅为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更彰显了国家推动预算制度深刻变革的决心。尽管改革之路充满挑战，但若成功实施，将极大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的目标定性是构建一套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以及维护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这一表述本质上聚焦于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目标。高质量发展作为综合性指标，涵盖了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度的协调发展；社会公平则直接关联到税收在资源分配中的公正性；而市场统一，作为当前特定发展阶段的需求，旨在通过税收手段促进市场的有效整合与高效运行，其本质上也是效率问题的体现。

在税制设计中，直接税因其对促进社会公平具有显著作用而备受关注。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演变，特别是数字经济等新兴业态的蓬勃兴起，如何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这些新业态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模式和商业逻辑，也对现有的税收体系提出了挑战。例如，关于数字税或数字服务税的探讨，就反映了业界对于如何在新技术背景下确保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关切。

值得注意的是，税收的首要功能是筹集财政收入，以支持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因此，在面对新业态带来的税收挑战时，首要任务是确保税收的有效征收，以维持财政稳定。同时，这也要求我们在税制改革中采取审慎态度，既要考虑税制对新业态的适应性，又要避免简单粗暴的征税方式，确保税收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因此，当前税制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研究如何使现行税制更好地适应新业态的发展上。这包括对传统产业中融入新技术所形成的新业态进行精准界定，并据此调整税收政策和征管措施。如果现行税制能够有效应对新业态的挑战，那么改革的目标便已实现；若存在不适应之处，则需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

在直接税体系中，个人所得税占据了显著位置，其中针对经营所得、资本所得及财产所得的征税策略尤为关键。特别是劳动性所得的统一征税原则，强调了劳动所得与其他形式所得在税负上的公平性。然而，实现公平并非易事，它涉及对“公平”概念的深入理解与具体方案的设计复杂性。就资本所得而言，探讨其税负的最终承担者及为何资本利得税率普遍低于一般劳动所得税率，需揭示其背后的经济规律，而非简单追求税率的统一。

税制设计的核心原则之一，是确保有能力者承担更多税负。然而，界定“有能力者”及其能力大小，进而设定合理的税率，是一项复杂且细致的工作。近年来，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了重要突破，特别是2019年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建立，通过年度汇算清缴及便捷的APP服务，极大地提升了税收管理的精准度与透明度。

展望未来，个人所得税制的进一步优化与扩展势在必行，包括但不限于对经营所得等更多领域的覆盖。同时，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升征管效率，是确保税制有效运行的关键。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地税合并、智慧税务建设等成就，标志着我国税收征管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金税工程的进化尤为显著，从最初的数字识别到如今的智能分析，展现了技术赋能税收征管的巨大潜力。当然，为

进一步提升税收征管效率，降低征管成本，还需在税务机构内部组织优化、技术应用深化等方面持续努力。

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

央地财政关系改革作为关键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占据了《决定》中的显著篇幅，充分彰显了其分量之重。新提出的改革目标清晰明确，旨在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框架。

其中，直面地方财力不足的问题，探索拓展地方税源成为重要议题，旨在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确保地方政府拥有与其承担职责相匹配的财政能力。这一过程中，既需考虑直接的资金支持，也需关注通过赋权增能来激励地方政府，财权配置问题将成为后续改革探讨的焦点。

此外，转移支付制度的优化亦不容忽

视。当前，转移支付规模庞大，已成为中央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管理和使用效率直接关系到财政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优化转移支付规模与结构，提升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效益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应致力于提升市县财力与其事权相匹配的程度，确保基层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其履行基本公共服务职能。

为加快改革进程，具体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显得尤为关键。只有通过明确的方案指导，改革措施才能有效落地，进而产生实际效果。同时，建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不仅是利益分配的问题，更涉及复杂的技术挑战和制度设计，这背后还有很多的研究空间。

关于消费税征收环节，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若不改革现行消费税制度，其推进将极为艰难。目前，消费税收入高度依

鉴于烟草、酒类、成品油及汽车等消费品，这些征税对象所提供的税收收入占消费税收入的95%以上。若考虑将征税环节后移，地方政府可能会因鼓励这些高税负商品的销售而面临征管难题。因此，消费税改革或需循序渐进，其增收效果需与改革措施紧密关联。同时，地方政府附加税的征管亦需考虑，其税率设定应具有一定的弹性范围，以适应不同情况。这一系列问题均聚焦于地方财政收入，而健全地方税体系的关键，或许在于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角色，而非仅局限于小税种。

关于专项债，其支持范围的扩大对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具有即时效应，但长远来看，更需关注其规范管理问题。

此外，非税收入管理应赋予地方一定自主权。

值得强调的是，中央事权原则上应由

中央财政承担，避免地方配套资金压力，这是保障地方财政稳定的重要一环。

财税改革的逻辑

财税改革的逻辑在于先立后破，确保财政运行的稳定是政策实施的前提。

同时，财税改革应致力于为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撑，并追求财政资金使用最大化效率。

然而，财税改革的落实难度不容忽视，它涉及多部门、多层面的广泛改革，需要顶层设计的引领与改革成果的巩固。以零基预算改革为例，其推进已属不易，而改革成果的维持更需努力。因此，梳理总结改革经验，无论是国内的经验还是海外的成功案例，都至关重要。面对改革过程中可能触及的利益格局调整，我们应充分认识其难度，并在方案设计上体现专业性。

赵波⁴：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与获得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未来经济发展做出新的部署，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党的十九大开始，我国经济已经由全面高速增长时期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而且意味着人民优先，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要让经济发展更好地惠及老百姓。这也是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维度。

4. 赵波：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包容性增长与获得感

20世纪90年代，大家在讨论新制度经济学时，曾广泛讨论的一种增长模式是“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方式，它强调机会平等增长，即全体人民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2010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做题为“深化交流合作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发言，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今天演讲题目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获得感”。2015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即现在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首次

提出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治国理政原则。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中，习近平主席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两个是否”上升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

经济增长固然可以反映在宏观数据里，但宏观总体统计往往缺乏对于微观个体的关注。“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在发展目标中，不同人群、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同等重要，而“获得感”则要求将微观经济个体的认可作为衡量改革成功的“金标准”。

提升经济发展包容性和获得感的五大途径

如何提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包容性和获得感？我认为这取决于我们能否解决好以下五方面的问题。

第一，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第二，优化公共品供给，缩小区域间差距。

第三，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调发展。

第四，平衡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第五，进一步提高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协调性。

第一，深化改革，促进收入分配公平

当前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居民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经历了短暂的上升和持续的下降，到 2009 年左右出现反弹，目前维持在 40% 左右的水平。居民的消费需求与老百姓的获得感直接相关，老百姓消费越多，越会感觉到自己是改革的获益者。

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度相关，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比重与消费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相同。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越多，即扣掉税费后拿到手的钱越多，其消费的意愿越强烈。当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整个国民经济收入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70% 多下降到 60% 之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是劳动者报酬。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也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基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要提升改革的获得感，非常重要的手段是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特别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影响国民收入中劳动者报酬占比分配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市场的因素，比如资本、技术、劳动三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关系、要素市场的竞争程度等，也有制度性的因素。举例来说，我国城乡二元的劳动力市

场曾经为城市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劳动力，但仍有不少劳动力离乡未离土，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约束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大壁垒。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为了城市发展做出了奉献，却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无法平等地享受当地户籍居民所拥有的教育、医疗、养老、居住等资源，城乡差距仍然显著。

《决定》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

我个人认为短期内，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以居住地为基础的公共资源分配将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壁垒，极大地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

的比重。长期来看，由于低技能劳动力面临资本和先进技术的替代，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劳动力素质将会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手段。

第二，优化公共品供给，缩小区域差距

公共品指的是由政府提供的，通常私人部门无法提供或不能有效提供的服务产品，如教育服务、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有些国家的公共品提供也依赖市场化途径。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公共品的提供存在典型的区域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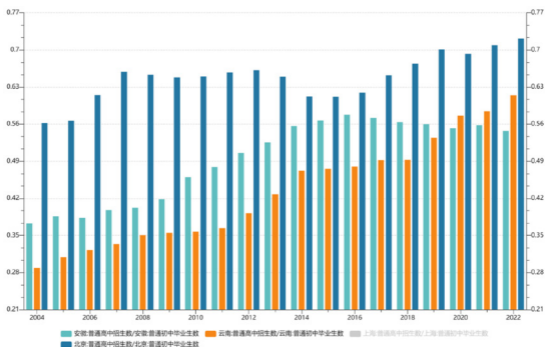


图1 北京、安徽、云南普通高中招生情况

图 1 比较了安徽省、云南省和北京市普通高中招生数量占普通初中毕业生数量的比值，反映了初中毕业生进入普通高中就读的概率。不难看出，北京这一比例最高，2004 年约有 56% 的初中毕业生进入普高，2022 年这一比例已升至 70%。安徽省 2004 年初中毕业生继续就读普高的比例很低，大约只有 35%，现在这一比例升至 50% 多，占比仍不算高。云南起初只有 28%，但近年来这一占比快速上升，已经

达到 60% 左右。仅在就读普通高中这一项指标上，不同地方的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虽然就读职高也是一种选择，但当前情况下我国职高的质量参差不齐，家长对就读职高也存在各种顾虑。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家长担心孩子考不上普高，只能选择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卷”孩子。教育作为最基本的公共品，政府有义务提供。然而有的地区读普高很容易，有的地区则很难，此外城乡差异也很大，这就造成了不公平，影响了老百姓的获得感。

如何让公共品供给更公平，发展更均衡？未来可以在很多方面发力。

在教育公平方面，《决定》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

在医疗保障方面，《决定》提出实施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

在养老服务方面，《决定》提出加快建立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扩大年金制度覆盖范围，推行个人养老金制度，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

这些部署大多是中央层面方向性的部署，到了落实层面还需要多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的配套政策。总体看，教育、医疗、养老与民生息息相关，老百姓的获得感在这些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未来应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第三，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协调发展

中央一直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是平等的市场主体，要一视同仁地对待。然而当前发展阶段依然存在一些制度上不完善，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待遇不平等，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存在一些歧视。民营企业可能觉得，虽然中央说了鼓励的话，但是与实际感知存在差异，没能充分感受到政策的温暖。

举例来说，2019年，中央针对房地产行业提出“三条红线”的调控政策。这直接造成了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降，房地产行业进入长期的结构性调整阶段。一些房地产企业的扩张受到影响，投资下降，经营也遇到困难。后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房地产纾困政策，多地取消限购政策，国家也降低了房贷利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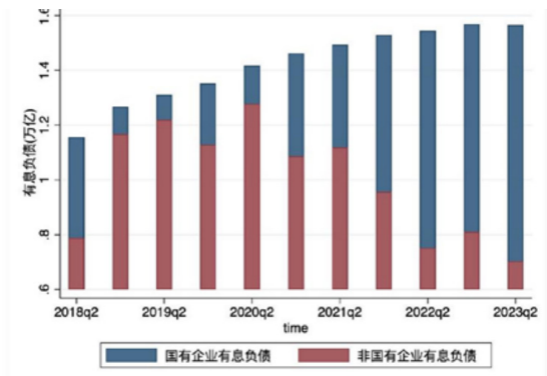


图2 上市房企有息负债余额总量和构成

图2是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库做的指标构建，比较了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三条红线”政策公布后的变化。有息负债的增长率在“三条红线”之后放缓。房企债务的扩张确实得到限制，但主要是收紧了对私营房企的贷款投放，国有房企负债仍然增长很快。如图所示，国有房企有息负债占比越来越大，“挤出”了私有房企。银行出于对经济形势的担忧，把钱借给国有企业更放心，倘若借给私营房企，银行担心资金

就此打了水漂，从考核机制上也不好交代。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都是改革中需要平衡和协调的关系。《决定》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我国已经有外资经济的投资法，有中小企业的投资法，但是没有与民营经济相关的法律。《决定》还提到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一点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甚至更早时候就已经提出，之所以每年都在提，说明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下决心进行更深层次的国企改革。比如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就是一个重点问题。国企之所以在很多领域和私营企业同台竞争，主要就是因为其定位问题。

《决定》中明确提出，未来国有资本的发展方向主要是“三个集中”，即推动

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作为学者，我们更加关心后续落实，特别是“三个集中”的第三点如何布局。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派一些国有企业负责？还是以平等的标准允许私营经济同样进入这些战略新兴产业？这些都涉及重要的具体政策步骤。

此外还有一些与国企改革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银行对国企的偏爱，政企尚未完全分开。很多人认为国企负债不是问题，甚至认为国企就是政府的一部分。诸如此类深层次的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央关于破除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一系列部署可能无法实现好的效果。

第四，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决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意味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需要平衡，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防止过度干预或监管不足。政府与市场间的边界划分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民企的体验感和获得感。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市场准入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不断完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已经大幅改善，民营企业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民营企业表示在现实经营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政府会设置一些隐形壁垒，也就是所谓的“玻璃门”问题仍然存在。民营企业可以参与一些重大项目的招投标，但最终还是因为一些限制而无法中标。还有民企反映“弹簧门”问题，比如先前说好的政

策临时变卦，这与地方政府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偏差有关。

总体看，当前针对民企的显性壁垒已经非常少，许多领域和地区的显性壁垒不再表现为直接的指定交易、差别待遇等，而是转为更加隐蔽复杂、种类繁多的隐性壁垒。地方政府经常以支持本地发展或健康、安全、技术、保证质量等名义增加种种限制，为保护本地企业、干预公平竞争等披上“合情、合法”外衣。这些隐性壁垒辨识难度高、对企业获得感的影响大。

《决定》中针对上述情况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件中的表述为“完善要素市场的制度和规则”。

第二，政府要做好监管，维护秩序。

文件中的表述为“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第三，弥补市场失灵，“建立政府投资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的长效机制”。

非常期待《决定》中的这些政策得到落实。

第五，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和协调性

现实中的宏观调控，常常是目标特别多，工具特别少。既有短期目标也有长期目标，既有内部目标也有外部目标，既有稳经济、稳通胀、稳物价水平的目标，也有稳就业的目标，还有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在政策目标制定过多的情况下，工具箱里的工具就显得捉襟见肘，政策的有效

性可能出现偏差。

比如，当前的货币政策较为宽松，在LPR引导下，无论是企业的利率还是居民购房的房贷利率都在下降，这是名义利率。然而不少企业仍然觉得融资成本高，房贷利率降了老百姓也不愿意马上买房。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在于对未来的房价增速预期和经济增长预期，更重要的是还有一部分实际成本并没有降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自2022年以来，企业和家庭的实际融资成本一直是下降的。所以，货币政策的传导性没有那么好，政策红利并没有真正传导到居民和企业身上。因此，当前我们需要结构性货币政策，在一定情况下推进财税政策。但这种取而代之的政策能否真正提高企业和老百姓的获得感，这仍需要观察。

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时期可用工具太多，相互间可能发生冲突。比如，经济

下行时，同时进行的还有房地产和教培行业的政策调控。

《决定》就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促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协同发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深化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等。通过采取这些措施，相信未来政策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会很小。

总结和展望

在我看来，改革和开放的最终目标还是要让利于民，让老百姓和私人部门获得更多好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通过上述五方面的

措施来不断增强经济发展中的获得感。我们的政策不仅需要平衡当代人和不同区域间的利益，还需要着眼于未来几代人的长远福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02.

产业观察

编者按：

为了实现中国向世界承诺的“双碳目标”，中国必须逐步进行绿色低碳转型。绿色低碳转型的任务复杂而艰巨，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有许多问题亟待研究与探索。

为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近日以“中国绿色低碳转型”为题举办 EMBA 论坛。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从学术角度解读了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迫切性、实现路径等议题。徐晋涛教授曾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大调研任务、



世界银行资助项目，多年来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有深入研究。

在本栏目的第二篇文章中，三位国发院 EMBA 校友与徐晋涛教授展开圆桌对话，共同探讨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的实践经验。三位分享校友分别是国家电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郑林，新奥数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产品拓展群召集人冯游平，和金风科技集团金风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晋。

他们的分享将帮助读者从学术、政策和实践等多个角度理解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未来。

徐晋涛：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几个关键问题

郑林 + 冯游平 + 潘晋：绿色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机遇



徐晋涛⁵：中国绿色低碳转型的几个关键问题

作为专注于环境经济政策的经济学家，我试图从经济学的多维视角，探讨绿色低碳转型的若干关键方面，并在此与大家分享四个主要议题。

首先，我们需要正视当前的环境与气候压力，探讨中国为何致力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以及为何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其次，我们将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双碳”目标进行深入的学术解读。再次，我将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出发，探讨实现“双碳”目标的可行路径。最后，鉴于碳中和目标

5. 徐晋涛：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经济学教授、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的实现既需要减排，也离不开碳的吸收与储存，我将特别关注森林碳汇的发展潜力及其政策需求。

背景：全球性的环境与气候压力

全球气候谈判历经 30 余年，终于在 2015 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达成《巴黎协定》。该协定的两大核心成果十分显著：一是全球 190 多个国家普遍接受了将地球表面温度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并努力不超过 1.5 摄氏度的目标，标志着国际社会在气候行动目标上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二是主要排放国纷纷提出了自主减排承诺，尽管在减排责任与时间表上仍存在分歧，但这一举措无疑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实质性进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印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了合理的发展

空间与权益。

然而，尽管有此积极进展，会议亦揭示了一个严峻现实：即便将主要排放国的自主承诺汇总，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仍居高不下，当前行动远不足以满足 2 度或 1.5 度温控目标的需求。因此，会议设定了 5 年的调整期，要求所有国家在 2020 年之前重新评估并提升减排承诺，以确保全球排放轨迹与既定温控目标相契合。这进一步凸显了中国采取积极气候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回顾全球气候谈判历程，《京都议定书》作为重要里程碑，设定了以 1990 年为基期的减排目标，要求工业化国家在 2020 年前将排放量降至 1990 年水平的 80%。这一基期设定凸显了 1990 年排放量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键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从 1990 年至 2021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率相对平缓，维持在 2% 至 3% 之间。

然而，自 2002 年起，排放量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出现一种超常规增长趋势，到了 2010 年，这个超常规增长量约达到 50 亿吨。

具体到中国，尽管其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在 1990 年至 2001 年间同样保持低位，但自 2002 年后亦出现了异常增长，与趋势线相比，2010 年的超常规增长部分约为 40 亿吨，占全球超常规增长量 80%。

中国在 2006 年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随后几年其占比持续上升，至 2012 年已占据全球排放量的近 30%，而美国降为 15%。时至今日，中国仍维持在全球排放量约 28% 至 30% 的高位。这意味着，在全球气候行动的框架下，中国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减排对于实现全球温控目标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若中国不采取积极行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效将大打折扣。

中国、美国、欧盟、印度、日本，这些经济体在全球碳排放中占据前列。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自 20 世纪 80 年代便已达到排放峰值，随后基本保持平稳或下降趋势；美国则从 2008、2009 年开始下降，这一变化部分归因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以及页岩气革命的兴起，使得页岩气（即天然气）在初级能源中的比例大幅提升，从而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然而，美国在 2010 年并未签署《京都议定书》，这主要是因为其承诺的减排目标（17%）未能达到议定书要求的 20% 减排幅度。

2009 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当时的排放数据有些滞后，美国仍被视为全球最大的排放国，并因此受到了部分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强烈批评。会议期间，针对美国的指责声此起彼伏，几乎使大会陷入僵局。

这一场景与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有相似之处，且中国面临的挑战可能更为严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但其实际减排表现却远超预期。这反映了美国在气候治理上的复杂国情，即联邦政府受国会制约，政策执行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

拜登政府上台后，通过了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气候政策，如《通胀削减法案》。该法案虽以经济议题为名，实则聚焦于气候变化，旨在通过提供超过每年 3000 亿美元的补贴，推动新能源和电动汽车的发展。此举不仅彰显了美国在新能源领域的雄心，也存在与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竞争的战略意图。尤为重要的是，《通胀削减法案》是两党共同支持的成果，这意味着即便未来总统更迭，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政策方向也不太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且其实施力度相当可观。

在主要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趋势中，中国无疑处于领先地位，持续高排放。尽管印度也在增长，但其排放总量相较于中国仍显较小，约为中国的 1/5 至 1/6。因此，印度目前仍可以强调其人均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自 2002 年起便已超越世界平均，现今更是其 2 倍以上。这一现状使得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任何停滞不前都将对全球努力构成重大挑战，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因此尤为巨大。国家领导层频繁就气候问题发声，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国际关切，环保部门职责的扩展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气候变化的重视。

双碳目标解读

“双碳”目标，即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与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中国在 2020 年对巴黎会议自主承诺的完善与深化。

“双碳”目标的设定，既是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对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基线情景到不同政策情景的模拟显示，中国在迈向碳中和的过程中，虽有望实现大幅减排，但在2050年至2060年间，仍可能存在20-3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中科院丁仲礼院士指出，碳中和并非零排放，而是指通过碳去除技术将剩余排放进行中和。这包括碳捕捉、碳封存和利用（CCUS）等工程技术手段，这些技术目前距离大规模市场化应用尚有一定距离。中国在人工造林方面成效显著，在发展中国家独占鳌头，具有比较优势。森林碳汇有望成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支撑。

与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情景相比较，全球的气候变化轨迹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这主要归因于中国在全球气候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中国的碳排放轨迹与全球轨迹大致平行，表明中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或者若全球气候行动失败，预计到本世纪末，全球表面温度将上升 3.7 至 4.5 度，且存在 10% 的可能性上升 6 度。这一温度水平相当于几百万年前地球处于“热室”状态时的气候，彼时二氧化碳浓度极高，地表温度远高于现今。这种极端情况下，海平面将上升 20 米，对中国尤其是上海、广州等城市将产生巨大影响。

在探讨不同气候情景时，实现 2 度和 1.5 度的温控目标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必须在远早于 2030 年的时间点达到峰值。这也是中美气候谈判中，美方持续提及提前达峰议题的原因所在。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具有政治挑战性的议题，因为它超越了科学讨论的范畴。

回顾过去 10 年，中国在控制碳排放方

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将 GDP 与二氧化碳排放轨迹并置分析，可以明显观察到，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自 2013、2014 年起趋于停滞，而同期经济增长仍保持了可观的势头，尽管近年来增速有所放缓，如去年达到 5.7%，今年若能达到 5% 亦属稳健。在此情境下，若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持续低于 GDP 增长率，则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现象。

然而，实现这一目标面临重大挑战，尤其在政治层面阻力重重。从国际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中可窥见，中国在推进碳中和过程中遭遇诸多难题。尽管从达峰角度看，前景相对乐观，但当前排放总量依然庞大，因此达峰后的减排任务尤为艰巨，即在未来 30-40 年内将排放量从达峰时的 130 亿至 140 亿吨大幅削减至 20-30 亿吨，实现 85% 至 90% 的减排目标，这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实现路径选择

1、能源结构调整

为实现这一目标，能源结构调整成为关键所在。

具体而言，需大幅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同时大力提升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这一转型过程不仅涉及技术经济层面的复杂挑战，还需不断根据国际压力及气候变化形势调整碳排放目标。

回顾个人经历，我初涉能源领域时，有幸与原北大工学院院长张东晓教授共事，他作为国际知名的天然气专家，常带我参与各类会议，让我深入了解页岩气的发展动态。2015年前后，业界曾对中国页岩气开发寄予厚望，认为其已接近美国页岩气革命前夕的水平。当时，基于国土资源部的勘探结果，中国可商业开采的页岩气储量甚至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若技术

难题得以突破，大量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将显著降低中国对外部能源的依赖，并极大优化能源结构，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类似于2008、2009年美国页岩气革命所带来的变革。然而，遗憾的是，中国页岩气革命并未如期到来，其背后原因尚待深入探究。

在过去几年中，气候行动领域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甲烷治理。自2020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后，2021年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成为了一个重要节点，全球多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并达成了多项成果，其中包括“全球甲烷承诺”倡议。尽管中国最初并未直接签署该倡议，但随后在中美联合声明中涉及了甲烷问题。去年，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在加州达成的“阳光协议”也与此紧密相关，中国政府出台了针对甲烷治理的行动方案，标志着甲烷治理被正式提上日程。值得注意的

是，甲烷的温室效应评估近期得到了 IPCC 的更新，从长期视角看，单位甲烷的温室效应强度被上调至相当于 80 多个单位的二氧化碳，远高于过去普遍认为的 30 单位。这一调整意味着，在追求碳中和的进程中，甲烷减排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未来中国将在甲烷治理上投入巨大资源。

森林碳汇作为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措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有结构转型的背后，都离不开政策的有力推动。经济政策，作为引导和塑造行为的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价格机制的调整，影响技术选择和经济结构。具体而言，提高“高排放技术”的成本，降低“低排放技术”的成本，从而激励经济体系向低碳方向转型。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如何通过优化经济政策，有效促进行为和技术层面的变革。

新能源领域的快速发展，是当前气候行动中的一大亮点。尽管面临国际贸易环境的挑战，如欧洲对中国新能源产品的贸易壁垒，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强大竞争力。中国新能源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影响力。然而，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大幅削减目标，新能源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需大幅提升，从当前水平向 80%-90% 迈进，这一过程将充满挑战与机遇。

在新能源的发展历程中有一点值得注意，补贴政策初期成效显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逐渐显现出对国家财政的沉重压力。2010 年前后，各地政府纷纷投身新能源发展热潮。一夜之间，电动汽车的生产企业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数量之多令人咋舌。然而，时至今日，电动汽车市场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不到 10 年间，市场经历了优胜劣汰，技术

日益成熟，市场格局愈发清晰，目前仅剩下 40 多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市场逐渐步入有序发展的轨道。

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大量资金投入和补贴支持。在新能源产业的演进过程中，补贴政策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自 2018 年起，国家对新能源的补贴政策转型为竞价上网机制，这一转变标志着政策框架的重大调整。至 2021 年，新能源补贴退坡。这不仅验证了补贴政策的巨大成功，还彰显了新能源行业已成长为全球范围内极具竞争力的领域。各国在贸易领域的防范举措，正是对其强大竞争力的有力证明。

具体而言，光伏技术的发电成本在过去 10 年间实现了惊人的 90% 降幅，推动了行业的持续扩张。尽管补贴力度逐渐减弱，但行业的增长势头依然强劲，这构成了补贴政策成功实施的罕见案例。

从经济学角度审视，经济政策中的价格政策主要分为补贴与税收两大类，前者可视为奖励性政策，后者则为惩罚性政策，二者分别对应于“面包”与“大棒”的治理逻辑。在学术讨论中，奖励性政策往往因可能滋生依赖与低效而备受质疑，担心补贴最终流向非预期对象，加剧问题而非解决之。然而，新能源领域的实践却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整体上展现出较为成功的政策效果。

光伏加储能的成本近年来迅速下降，据预测，直至2030年方能与当前电价持平。然而，实际情况远超预测，近期有团队报告指出，仅在过去一年中，储能成本便下降了70%。这使得2023-2024年间的趋势线发生了显著转折，光伏加储能的发电成本已低于当前的上网电价。当然，这一乐观消息仍需业内专家进一步验证与指正。

甲烷在气候政策中的重要性近年来也

显著提升，特别是格拉斯哥大会后及 IPCC 对甲烷与二氧化碳等效温室效应因子调整之后。尽管甲烷治理相对复杂，因其来源多样。能源生产和农业生产两大主要方面各占约 50%。在农业生产中，甲烷排放主要源于畜禽粪便(4%)、畜禽消化道(21%)及水稻生产等。此外，城市垃圾处理也是甲烷排放的重要来源。因此，未来甲烷治理需能源行业持续努力，同时农业等非传统领域也需采取重大举措。

环保督察现已覆盖农业领域，关注城市废物排放、垃圾处理及畜禽粪便管理等问题。过去，沼气项目曾旨在解决农村能源短缺与家居卫生问题，但随着电力普及与价格稳定，沼气项目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当前沼气技术与设备企业面临转型机遇，集体治理沼气与畜禽粪便成为新商机，旨在有效减少甲烷排放。

2、经济政策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在中国，环境政策与气候政策的初期显著特征是对行政手段的高度依赖，这种手段往往倾向于“一刀切”的做法。然而，2021年的能源危机，特别是电力短缺与煤价飞涨现象，促使我们对节能减排领域的行政手段进行了深刻反思。当年，由于电力供应紧张，多地不得不在6、7月份实施拉闸限电措施，甚至影响到东北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用电。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国务院在2021年10月份召开的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多项应对措施，旨在深化能源市场改革，强化产销衔接，并扩大电价浮动范围。尤为重要的是，会议强调了避免重蹈“运动式减排、减碳”的覆辙，避免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

分析电荒背后的原因，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长三角地区主要受能源双控政策影响，年中即出现超标情况；珠三角则因西电东送受阻，特别是云南旱情导

致的发电能力下降及高耗能产业扩张，使得电力供需失衡；东北地区则因煤价飙升，发电企业普遍亏损严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地区的“运动式减排”现象尤为突出，一旦指标超限，地方政府便迅速采取拉闸限电措施，这不仅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也严重损害了节能减排政策的声誉，使得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针对上述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为摆脱这一困境指明了方向。

当前，中国的气候政策体系被概括为“1+N”模式，其中“1”指的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这是一份具有深远意义的文件，与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精神紧密相连。该政策的核心在于反对运动式减排与减碳，提倡建立长效机制，以避免对经

济造成剧烈冲击。长效机制的关键在于其温和性与低社会成本，它要求环境执法具备稳定性、法治性与自觉性。当前，虽然已有环境法、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大气十条”等政策措施，但环境执法仍面临执行不力的问题，导致运动式执法与突击检查成为常态。然而，这种方式并非长久之计，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将环境监管责任从中央政府转移至地方政府，使其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避免运动式减排与减碳所带来的高昂社会成本。过去，环保督察往往导致大量企业关停，尤其是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这对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打击。因此，我们需要转向经济政策，以替代传统的行政手段。

经济政策在降低社会成本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例如碳交易市场，通过市场机制

使各企业的边际治理成本趋于一致，从而实现以最低成本达成减排的目标。碳交易市场之所以被视为实现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不仅因为其目标明确，更在于它能以最低的社会成本达成这些目标。当社会成本降至最低时，对经济发展的冲击也相应减小，从而更容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与配合。因此，推动碳交易市场等经济政策的实施，对于构建长效的环境治理机制、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政策主要可划分为两大类：价格类政策与数量类政策。碳交易政策属于后者，其核心在于政府虽不直接了解企业的减排成本，但明确减排目标，并据此将一定量的排放许可分配给各排放企业。鉴于不同企业的减排边际成本各异，碳交易市场允许这些排放许可进行交易，从而促使减排边际成本最终趋于一致，实现以最低社会成本达成减排目标。在此机制下，减

排成本较低的企业将承担更多减排责任，并通过出售多余排放许可获得收益，而减排成本较高的企业则可选择购买排放许可以减少自身减排压力。

价格手段主要包括补贴与税收两种形式。就补贴而言，尽管其成功案例较为罕见，但可再生能源补贴却是一个相对成功的典范。这类补贴不仅有效推动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且在适当的时候及时退出，避免了长期依赖与资源错配，这是衡量补贴政策成功的关键标志。事实上，许多行业的补贴政策难以顺利退出，导致问题累积、漏洞扩大。这往往源于补贴设计的初衷与实施过程中的监管不足，形成了错误的补贴政策导向，最终往往以政府强制退出而告终。

相比之下，税收政策则展现出更为稳健的特性。税收作为一种惩罚性措施，其设计初衷在于遏制不良行为。补贴政策有

时可能无意中鼓励了“坏人”的行为，比如通过扩大生产以获取更多补贴，而税收则直接针对污染或不良行为征税，确保“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得以实施。不过，税收政策的制定要求政府对企业边际减排成本、边际效益等信息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以确保税收政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基于这种信息制定的税收政策，能够更为精准地引导企业行为，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我个人更倾向于税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之一，尽管当前中国气候政策的主流是碳交易体系。我认为，在未来，碳税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鉴于近年来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实际挑战。初期设立的7个碳交易试点，经科学评估，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理想状态。随后，全国性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也被多次推迟，最终于2021年启动，并首批纳入了约2000家火力发电厂参与交易。根据“十四五”期间

的规划，碳交易市场将逐步扩展至钢铁、水泥等其他高排放行业，但总体目标仍局限于 4000 余家企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实际拥有 5000 万余家企业，其中可能有一半存在不同程度的排放。鉴于如此庞大的企业基数，将所有企业纳入碳交易体系显然不现实。因此，即便是设计碳交易市场的专家也普遍认同，对于小型企业而言，实施碳税可能更为适宜。

欧盟目前正推进边境调节机制，尽管当前仍处于第一阶段的数据收集阶段，但基于防止碳泄漏的初衷，该机制未来势必会扩展至覆盖所有产品。届时，若中国产品出口至欧盟，将面临依据其碳足迹征收的碳关税，其税率将与欧盟碳市场价格保持一致。回顾欧盟碳市场，去年三、四月份时，碳价曾高达每吨二氧化碳 90 欧元，而近期已回落至约 70 欧元。相比之下，中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几乎处于零成本状

态，即排放免费。中国国家级碳市场仅在履约期偶尔出现交易，价格大致徘徊在人民币 50 元左右。然而，一旦面临 70 欧元的碳成本，所有化石能源行业将承受巨大冲击。

但更重要的是，当前的碳交易市场难以有效应对碳关税的挑战。在国际贸易中，企业必须证明其在中国境内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已支付了相当于 70 欧元的成本，方可免除欧盟的碳关税。这种边境调节机制，相较于贸易战时期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更为复杂且合理。若企业在国内已承担 70 欧元的碳成本，则无需再向欧盟缴纳关税；若仅支付了 60 欧元，则需补缴差额。鉴于此，未来在贸易环节，中国政府或将采取创新策略，确保不向欧盟支付额外关税，而是选择在国内自主征税，并将税款用于国内发展。这一趋势可能促使小企业和贸易环节均纳入碳税体系，最终形成碳交易

与碳税并行的混合体制。长远来看，我预计在未来 15 年内，中国或将全面转向碳税制度。

碳税之所以被视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主要源于其双重红利的特征。首先，通过征税纠正市场失灵，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性，提升市场效率。其次，碳税收入可用于抵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劳动所得税或增值税，从而进一步减少市场扭曲，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这种税收转移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还能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促进环境友好型政策的实施。

2023 年在迪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上，由德国倡议的“气候俱乐部”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尤为深远，因为中国过去的主要出口市场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及澳大利亚等，这些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推动作用。若欧盟实施碳关税政策，中国企业或许能通过产品调整增加对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的出口以应对。然而，气候俱乐部的成立则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该俱乐部涵盖了 G20 所有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 10 多个发展中国家，共计 37 个国家，其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30%。这意味着，气候俱乐部可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向中国征收碳关税。

具体而言，若气候俱乐部内部设定每吨二氧化碳排放需支付 50 美元的碳价格，则向该俱乐部任何成员国出口产品均需承担这一成本。此举将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碳价标准，与欧盟仅覆盖部分市场的做法截然不同。随着日本、美国的加入，全球主要市场都将实施碳关税，这将从产业链下游开始倒逼全球形成统一的碳价格体系，其影响极为深远。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变化将极大地影响能源结构和产业产品结构。长期以来，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调整能源结构，但进展缓慢。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主要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价格激励机制。一旦全球碳价格形成并上升，将推动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加速转型。

最终，所有问题的核心都归结为成本效益的比较。若成本效益显著提升，这些问题都将迎刃而解。鉴于市场逐利的本质，当前大量投资涌入新能源领域，正是基于其未来的预期收益。若火电厂需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支付高达 50 美元的费用，它们无疑会将资金转向新能源领域，从而极大加速能源结构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对中国影响深远，对全球气候行动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我认为，经济政策也是推动社会公正转型的必要手段。尽管存在多种转型路径，

但公正性应成为我们选择路径的重要考量。遗憾的是，过去我们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如关停并转等方式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这种做法在“十一五”期间尤为显著，虽然成功实现了能源强度下降 20% 的目标，但主要手段是关闭了大量的小钢铁厂、小火电厂及小水电站，这些多为民营和小微企业。在此过程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因市场空间的释放而相对受益，并获得了国家节能减排的大量扶持资金，用于安装脱硫、脱硝等环保设施。然而，这种转型方式显然缺乏公正性，不仅加剧了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也违背了政府扶持民营经济的初衷，对民营和小微企业造成了不必要的打击。

相比之下，经济政策在推动转型时展现出了更高的公平性。它不受企业所有制形式的限制，而是基于排放量来实施收费，这使得那些环保表现优异的民营企业即便

在缴纳费用后也能继续正常运营。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角度来看，民营和小微企业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它们在推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从效益与公平双重维度出发，我们应当反思并调整当前的环保政策，避免对民营和小微企业造成不公正待遇，确保所有企业都能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参与低碳绿色转型。

森林碳汇

关于森林碳汇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2022年4月，解振华特使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明确提出，中国气候行动包含三大关键内容：1+N政策体系、能源转型和森林碳汇。其中，森林碳汇被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

面对2060年碳中和时可能剩余的20亿至3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森林碳汇能否

承担如此重任仍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我认为，实现碳中和目标仍然充满希望，中国在人工造林方面的卓越能力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独一无二，且未来潜力巨大。

具体而言，潜力来源于三个主要方面：

1. 外延扩大再生产，即继续扩大造林面积。但此潜力相对有限。当前，中国森林碳汇量约为 8-9 亿吨，即便再增加 4%-5% 的面积，也仅能额外吸收不到 1 亿吨二氧化碳，这与 20-30 亿吨的目标仍有较大差距。

2. 内涵扩大再生产，即提升森林质量。尽管中国在全球绿化方面贡献显著，但森林的蓄积量增长并不显著。与全球平均每公顷 137 立方米的蓄积量相比，中国仅为 80 立方米（乔木林约为 92 立方米），存在显著差距。若能将中国森林的蓄积量提

升至世界平均水平，即从当前的 80 立方米或乔木林的 90 立方米提升至 130 立方米，则森林碳汇量有望接近翻倍。在此情境下，即使保守估计，中国森林碳汇的年度增量达到 15 亿吨完全可能。

3. 产品市场替代。森林资源会面临自然衰败、火灾、病虫害等风险，导致碳释放回大气中。因此，为实现长期固碳，需发展长期固碳的林产品产业。家具和现代木结构房屋是最常见的有长期固碳能力的林产品形式。若提升木材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农村住房向木结构转变，将显著减少碳排放。以美国为例，其独立住宅几乎全为木结构。若中国能提升单位面积蓄积量至世界平均水平，并增加木材在家具、住房等长期固碳产品中的使用，可轻松替代三分之一的建筑材料生产过程中的排放，每年可减少约 9-10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保守估计）。结合森林碳汇的

自然增长，总减排量可达 25 亿吨左右，与丁院士提出的 20-30 亿吨目标相吻合，从而有效实现碳中和。

当前，尽管在体制政策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关键障碍，导致单位蓄积量未能有效提升。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砍树即破坏环境”的误解，已经对林业发展造成极大困扰。在中国，超过 50% 的林木为商品林，生产者依法享有砍伐的权利。然而，在现行体制下，砍伐行为需经政府严格审批，这导致许多地方对砍伐申请持谨慎态度，甚至不敢批准。这一状况严重阻碍了私人投资者的进入，特别是那些具备专业特长的投资者，进而限制了林业生产的规模化发展。因此，单位面积蓄积量难以提升，森林质量低下。

不合理的体制与政策环境，加之政策稳定性的缺乏，使得林业从业者难以获得稳定收益，最终导致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下

降，面临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自 2008、2009 年以来，中国木材产量增长停滞，而木材销售量却持续攀升，其增量主要来自进口木材，目前进口比例已接近 60%。这一趋势凸显了提升国内木材生产力的紧迫性。

此外，国际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中美协议中明确双方需共同努力防止森林减少。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木材进口国，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大量进口木材源自热带毁林严重的国家，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国际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改善现有的林业经营政策环境，鼓励私人投资者进入林业领域，实现规模化经营，从而提升森林质量和木材自给的能力。

未来，深化集体林权改革将是关键一步。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多次批示要深化这一改革，旨在将更多林地分配给农民，并赋予林业生产者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当前，

各省份正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逐步取消对生产者经营自主权的限制。我们有理由相信，若这些改革措施得以有效实施，未来十几年内，中国将有望迎来一个活跃的木材经济时代，森林质量将得到显著提升，从而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郑林 + 冯游平 + 潘晋⁶： 绿色低碳转型的实践与机遇

柴豫荣⁷：今天论坛的对话环节，我们聚焦探讨“双碳”目标在企业中的落实。我们请到三位行业经验丰富的校友。请三位先谈谈自己的企业在发展与减排两项任务之间遇到的压力与挑战。

郑林（国家电网）：就电力行业而言，我简要谈几个关键数据。

首先，电力行业是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6. 郑林：北大国发院 EMBA 校友、国家电网英大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冯游平：北大国发院 EMBA 校友、新奥数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产品拓展群召集人。

潘晋：北大国发院 EMBA 校友、金风科技集团金风环保有限公司总经理。

7. 柴豫荣：北大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助理院长、EMBA 中心主任。

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能源行业在整个碳排放中占比约 80%，电力行业的碳排放占比超过能源行业的 40%，约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实现“双碳”目标，能源是主战场，电力是主力军。

其次，新能源装机呈现出迅猛增长的趋势。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的总发电装机容量是 29.2 亿千瓦，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达到 14.7 亿千瓦，历史上首次超过总装机容量的 50%。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显著推动了减碳目标的实现，标志着新能源与清洁能源的发展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我国新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竟相当于美国全年的总量，其发展速度之快，令人瞩目。

最后，展望至 2030 年，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阶段性成果，在煤电保持相对平衡与合理控制的前提下，我国每年需新增约 3

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容量。这不仅是新能源发展的绝佳机遇期，更伴随着成本的不断降低。得益于技术进步、创新突破以及广泛而有力的政策支持，新能源的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为电能替代等发电侧的新能源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广阔的前景。

在新能源发展的传输侧，国家电网作为承担国家超过 80% 电力传输的重要角色，其特高压技术的发展尤为关键。鉴于中国能源资源多集中于北部与西部，而水电资源则富集于西南部，负荷中心则分布于南部与东部，如此广阔的地域分布对电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特高压技术的应用，如同中国高铁一般，成为了国家科技进步的又一象征，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展现了世界级的创新能力。截至 2023 年底，国家电网已在国内建成 35 项特高压工程。

新能源的迅猛发展对电网运输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国家电网致力于通过建设大容量的主干电网通道，强化新能源的消纳与运输能力。至今，特高压工程已累计输送电量超过 2.9 万亿千瓦时，实现二氧化碳减排 26.1 亿吨，清洁能源输送比例超过 40%，并呈逐年扩大趋势。随着“沙戈荒”地区新能源开发的深入，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的特高压工程作用日益凸显，投资规模也随之扩大。

此外，抽水蓄能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装机规模在未来两年内将达到一亿千瓦，国家电网在此领域的领先地位不仅体现在装机容量上，更在于其对调峰调频及新能源消纳的重要贡献。智慧配电网的发展则进一步推动了用户终端消费的数字化与智能化进程，新型储能、电动汽车及综合能源等技术的兴起，使得配电网在能源体系中的接口作用愈发显著。

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能源电力安

全、经济、清洁“不可能三角”面临新的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电网积极响应总书记关于建设新型电力系统与新型能源体系的号召，依托科技进步、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及政策环境的优化，不断加大投入，通过科技创新布局推动新型电力系统的建设。这一过程旨在解决新能源发展中的路径、成本、交易及调度优化等问题，展现了国家电网在推动新能源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方面的坚定决心与强大实力。

冯游平（新奥能源）：作为综合能源领域的老兵，我分享几点关于低碳转型的见解。电力被明确视为低碳转型的主战场和主力军，而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在系统转型过程中则扮演着主配网侧有效补充的角色。

我认为，企业的低碳转型不应被视为一种束缚或压力，而应成为推动企业向前

发展的强大动力。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在于数字化。数字化技术正助力企业更有效地降低用能成本，实现生产经营的智能化调节，成为转型过程中的得力助手。

然而，低碳转型并非单点突破，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企业战略升级、管理重构以及文化重塑等多个层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新奥集团早在多年前便提出了全面拥抱数字化的战略，但在实施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产业与数字融合的核心问题：是产业主导数字融合，还是数字引领产业变革？这一主导权的归属问题，让我们在转型之路上经历了诸多波折，也是当前众多企业在转型过程中亟需深思的议题。因此我认为，在低碳转型的征途中，明确转型的主导者与牵头者至关重要。

新奥作为民营企业在能源领域深耕三十余年，特别是在燃气产业及相关领域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我们不仅是国内最早

倡导并构建产业互联网平台大生态的企业之一，还在2009年由公司主席提出了“泛能”理念。这一理念的核心在于，一切从用户需求出发，贯穿能源全价值链进行开发，实现多能互补，并优先采用清洁能源，最终构建企业用能一体化的能源系统。基于这一平台，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成功落地了近两千多个园区能源项目。

例如，2022年我们与全球排名前十的乳制品企业进行了深入合作。针对该企业提出的关于产品单耗及碳排放的精准管理需求，我们提供了能碳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项目实施后，企业能效显著提升，直接带来了超过两千万的经济产值增长。这是我们在乳品行业数字化探索中的一个成功案例。

此外，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在成本控制方面的需求日益凸显，特别是能源成本的降低成为关注焦点。在浙江，我

们注意到分布式光伏项目虽在广泛推广，但普遍存在装机容量小、运维管理粗放的问题。为此，我们为一家光伏投资企业量身定制了数字化管理平台，针对其近百兆瓦的装机容量，一年便实现了近 300 万元的运维人工费用节省。该企业计划未来扩大至 600 兆瓦的装机容量，预计年运维成本节省将达到千万级别。这些实践充分展示了我们在助力不同行业、企业实现降碳、低碳转型方面的具体成效。

潘晋（金风科技）：我分享三点。第一，2021 年，中央明确提出要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战略非常重要。当前数据显示，中国在能源安全方面仍面临挑战，具体表现为 70% 的原油和 40% 的天然气依赖进口，这对国家的能源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推动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转型，成为我们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第二，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型，能源形式上有根本性变化。传统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储量有限且不可再生，消耗越多则剩余越少。而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则具有可再生性，理论上每年都能持续供应。

再者，从我 2007 年进入这个行业至今的观察来看，新能源技术的成本降低速度惊人。以光伏组件和逆变器为例，2012 年光伏组件价格高达 9 元 / 瓦，逆变器价格约为 2 元 / 千瓦；而时至今日，光伏组件价格已降至约 0.8 元 / 瓦，逆变器更是低至 0.15 元 / 千瓦左右，成本降低了约 90%。风机装备的成本从最初的万元 / 千瓦降至如今的约 900 元 / 千瓦，降幅同样巨大。此外，随着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的显现，光伏和风电的上网电价也大幅降低，已接近甚至低于传统能源的发电成本，为企业新能源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

然而，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诸多挑战，如电网消纳能力、电网安全性等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柴豫荣：徐老师对三位校友的分享有什么回应？

徐晋涛：大家分享了新能源领域与国家能源转型方面的最新进展，这极大地增强了我对国家能源转型前景的信心。从电网作为能源服务核心的关键角色，到消费端的积极参与，再到可再生能源企业的蓬勃发展，各领域均展现出强劲的发力态势，这无疑是国家能源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力。

此外，大家也普遍提出了共同面临的挑战与压力，但我认为当前的政策导向是正确的，技术进步还会继续加快，所以现存的问题都将逐步找到解决之道。

柴豫荣：接下来想请三位校友展望未来，谈谈这些领域可能迎来的新机遇与挑战。

郑林（国家电网）：关于潘总及徐教授所提及的能源安全问题，我深感赞同。我国将粮食安全、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并列为三大安全支柱，其中能源安全的地位尤为关键。在探讨新能源与常规电源的发展时，必须明确两者间的互动关系。一味追求新能源发展，而忽视常规电源（尤其是火电）的支撑与保障作用，将对经济产生深远且重大的影响。以去年四川电力短缺为例，四川作为资源大省，水电资源丰富，但去年遭遇枯水期，上游来水不足，加之其电网结构特点——以区域小水电网为主，与大型电网连接不足，火电装机比例低于30%。因此，当水电进入枯水期时，发电量急剧下降，缺乏火电支撑，导致在夏季用电高峰时期全国电力供应紧张。这一案

例充分说明，新能源与常规电源的发展必须保持可持续性 with 协同性。

此外，源网荷储（即电源、电网、负荷、储能）的协同发展对未来能源安全至关重要。通过多能互补的方式，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系统的整体效率和稳定性，是能源安全发展的重要路径。

最后，无论能源如何发展，能源安全问题始终存在，而节能则是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能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因此，节能应成为全民及企业的自觉行为。在能源总量有限的背景下，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浪费，是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在此呼吁并建议大家树立节能意识，共同为能源安全与发展贡献力量。

冯游平（新奥能源）：我想以湖南为例，在面临能源供需紧平衡的局面，整体处于全国能源流向末端，能源对外依存度曾高

达 80%。电力结构中水电占比较高。这种高度依赖外部输入的结构，使得上游送端供应问题或本地水文条件变化（如枯水期、熔枯期）均会显著影响电力供应。随着全国电力市场的统一化进程加速，电价波动性日益增强。此外，湖南的燃气能源也几乎完全依赖外部输入，进一步加剧了能源供应的波动性。

在此情境下，作为能源服务商，我们需敏锐捕捉政策变化与价格波动，灵活应对企业转型的挑战。以 2022 年湖南天然气价格骤升为例，这一变化对高度依赖服务业（尤其是酒店业）的湖南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酒店业因入住率波动，难以直接通过提高房价来消化成本上升，而热水、供冷、供热等能源需求却居高不下。针对此困境，我们推出了电能替代解决方案，成功助力三百多家酒店项目落地，有效缓解了其能源成本压力。这一实践表明，在

挑战中往往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机遇。

再举一例，当前新能源分布式光伏项目在江浙等负荷密集区落地迅速，有效缓解了当地电力供需紧张的状况。然而，新能源项目的引入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与电网、投资方的结算效率问题。传统线下结算方式繁琐低效，我们通过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了线上对账、结算与代扣，将原本需一个月的结算周期缩短至两天，极大提升了效率，为分布式光伏投资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从企业与市场的视角来看，通过深入理解政策导向、精准把握市场价格动态及客户需求，我们能够为客户设计出既安全便捷又经济的商业模式。随着技术进步与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此类成功案例将不断涌现，充分证明在能源转型的大潮中，机遇始终大于挑战。

潘晋（金风科技）：我简要阐述两点见解。首先，我国提出的“30·60”碳达峰与碳中和政策，其深远影响不仅局限于当前与能源及其他相关领域的关联，未来更将广泛触及每个人的生活。当前，政策已针对八大行业中的两千多家高排放企业实施管控，未来这一范围有望扩大至更多企业，包括中小企业，且如北京、天津等城市已初步设定企业碳排放限额，大致在4000吨至5000吨之间。这意味着，未来拥有碳排放指标或将成为企业保持产能的关键要素。

其次，未来的生产模式也将发生显著变化。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将深度融合大数据与数字化技术，彻底改变生产方式。企业可能需要根据绿色电力的供应情况来安排生产活动，即“有绿电则生产”，或者当企业成为绿色电力的发电侧时，其产能与电力供应将形成新的互动关系，这种

变化将彻底颠覆传统生产模式。

此外，税收制度、个人收入以及企业间的碳交易收入也将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以美国某公司为例，尽管前几年处于亏损状态，但在2020年和2021年通过碳交易实现了约7亿美元的盈利，而其碳汇销售收入更是高达20亿美元。这表明，随着“30·60”政策的深入实施，企业间的碳交易将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这一政策还将推动工业革命的新一轮发展，加速原有煤炭、油田等基础设施的资产贬值，同时促进有利于减碳的新型资产设施的快速发展。这一系列变化，最终都将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03.

管理课堂

编者按：

本期的“管理课堂”栏目包括一篇专栏文章和两场对话实录。

专栏文章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BiMBA 商学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卓教授在今年9月的一场演讲。关于如何理解和面对当今时代的不确定性，他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给出了解答。



两篇对话实录均为学者与业界的思辨。

第一篇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中信出版集团携手举办的以“变局时代的管理哲学与挑战应对”为题的新书悦读会。在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王贤青的主持下，华润、中粮、中化前董事长宁高宁携其新著《三生万物》，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华为高级管理顾问黄卫伟，领教工坊创始人肖知兴，围绕“如何主动选择成长环境”“如何阅读”“如何面对新的职场环境”“如何在组织可控性与组织活力之间保持平衡”等话题进行探讨与分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第二篇来自北大国发院“承泽商学”第3期活动。围绕“变局时代的战略与军事领导力”主题，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国发院BiMBA商学院前联席院长杨壮，溪木源创始人刘世超、创新工场合伙人郎春晖展开对话交流，对话主持人为景钰智库创始人魏然。

黄卓：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时代？

宁高宁 + 黄卫伟 + 肖知兴：变局时代的管理哲学与挑战应对

杨壮 + 刘世超 + 郎春晖 + 魏然：变局时代的战略与军事领导力



黄卓⁸：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时代？

我的分享将围绕过去几年来的研究成果及个人思考展开——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时代。

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

在当今世界，若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么“不确定性”无疑是最贴切的。自2000年左右开始，世界便逐步进入了一个高不确定性的时代，与之前形成了鲜明对比。2020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8.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BiMBA商学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当今世界正经历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我最近刚从上海外滩金融峰会归来，今年峰会的主题就是“应对变化的世界”。自2018年以来，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美关系方面，从特朗普上台后的加征关税到通过小院高墙政策对中国高科技领域不断加强限制；全球化的趋势出现了逆转；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对公共健康及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造成了巨大冲击；俄乌冲突的爆发更是加剧了全球局势的紧张；巴以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变得严重；这些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

在当前这个时代，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便是满满的不确定性。国外学者构建的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显示，2000-2018年曾长期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但自2018年起，不确定性水平

逐渐提升。对于企业家而言，对于这种变化感受可能更加深刻。

不确定性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过去平均每年9%左右的高速增长，逐渐进入增长5-6%的新常态。我记得2019年，经济学者们曾热烈讨论中国的名义GDP何时达到美国GDP的90%，或者在总量上超越美国。也曾探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何时破6，以及房价是否还会持续上涨。然而，短短几年后，很多趋势都发生了变化。

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房地产市场刚性泡沫硬着陆，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到来，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特别是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的下降，加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与此同时，从数字平台到教育培训、医药集采、金融和房地产，这些行业的从业者都会感受到

监管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不确定性的特征与影响

作为研究金融风险领域的学者，我近年来对不确定性进行了系统研究。

不确定性的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世界本身的客观随机性，即物理世界中存在诸多未知因素，结果是未定的；

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确定性；

三是决策主体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主观感知；

四是源于人有限的理性和认知能力，即我们在决策时受限于自身的知识和信息。

不确定性的概念在学术上并没有严格界定。在管理学中，不稳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是跟不确定性紧密相关的概念，它

们共同构成了乌卡（VUCA，volatility、uncertainty、complexity、ambiguity）时代的特征。此外，经济学和哲学家 Frank Knight 对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能够用数学概率描述的风险是清晰定义的，而超出这一范畴、无法用概率建模表述的风险则被称为不确定性，这赋予了不确定性更深层次的哲学意义。

不确定性在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等。此外还有因为选举结果、官员更替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公共健康领域的不确定性。可以说，不确定性在当今的经济和社会中无处不在。

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决策与行为，学术界自 20 世纪 80、90

年代起便开始了深入研究，可以总结为下面几个机制。

其中一个经典的机制——实物期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视角。实物期权理论指出，当我们的行为决策伴随着高昂的调整成本时，如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劳动力雇佣或个人的生育决策，这些决策因其高昂的调整成本或不可逆性而被视为一种实物期权。在此情境下，决策者拥有选择权：立即执行决策或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时，根据金融理论，期权的价值也随之提升。这意味着，在不确定性高企之际，决策者更倾向于保持观望态度，即“wait and see”，而非贸然行动。这解释了为何在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家会谨慎对待投资决策，企业会减少雇员招聘，而年轻人会在高不确定环境下选择推迟生育计划。

第二个机制是预防性储蓄。由于企业

面临融资约束，当预期不确定性加剧时，企业倾向于自保，增加现金储备以应对潜在业务冲击和流动性风险；家庭则会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耐用品消费。第三个机制是不确定性还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摩擦，抑制投资、融资及并购等经济活动，导致企业家减少风险承担行为。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正如知名经济学家吴晓求所言，企业家的信心主要来源于法治的力量。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及监管政策，能够为企业家提供必要的确定性，从而增强其信心。作为国家级高端智库，我们北大国发院的学者们长期以来围绕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构建更加确定性的经济环境贡献力量。

用企业家精神应对不确定性

从企业家和个人的角度，如何有效应

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上升？在此，我总结了两个关键维度：一是增强风险意识与应对能力，通过多元化投资策略、建立应急储备等方式，提高抵御不确定性的能力；二是积极适应变化，保持灵活性，不断调整和优化自身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首先，我想分享的是来自张维迎老师的智慧。最近，他出版的一本新书《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深入探讨了企业家精神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应对策略关键点——用企业家精神应对不确定性。

这一观点最早由企业产权理论大师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在其一系列著作中阐明。他深化了不确定性理论，并将其与企业所有权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风险产生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则是利润的来源。具体而言，企业家

之所以能够获取超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勇于承担并管理那些难以量化，甚至无法预见的不确定性。

张维迎老师在书中进一步区分了管理决策与企业家决策的不同。他指出，在企业运营中，约 95% 的决策属于管理决策范畴，这些决策可以通过职业经理人和既定理论来有效指导；然而，剩余 5% 的重大决策则需要企业家精神的介入，这些决策往往要求超越现有约束，通过创新手段寻找新的资源、创造前所未有的产品或规则。这种创新精神的核心，正是面对并驾驭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

更进一步地说，应对不确定性并不仅仅意味着被动接受，而应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拥抱态度。我们应将不确定性视为企业和个人发展的契机，努力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在这里，我想提及风险与不确定性研究者塔勒布，其著作《黑天鹅》和《反

脆弱》广受欢迎。前者揭示了小概率事件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而后者则倡导从不确定性中受益的积极态度。塔勒布本人作为基金经理，其交易策略正是基于极端尾部风险的押注，这种策略在金融危机期间为他带来了显著收益，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利用不确定性实现商业成功的生动案例。

要实现反脆弱性，首要且至关重要的一步是确保生存能力，正如余华小说中所述，要竭尽全力活下去。对企业而言，意味着要减少自身的脆弱性，如谨慎管理资金，避免轻易用本金冒险，并高度重视现金流的稳健。

其次，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外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为了减轻系统性风险对公司或个人业务的冲击，我们需要采取相应措施。过去几十年中，许多人的成功往往伴随着市场整体的上升，这在金融领域被称为“贝塔系数”带来的成功。

然而，当风险来临时，这种成功也可能迅速瓦解。因此，我们更应追求的是“阿尔法”式的成功，即基于个人能力或核心竞争力所取得的成就，并努力降低对外部环境的过度依赖。

反脆弱的另一关键在于积极构建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将不确定性管理融入业务运营之中。当不确定性发生时，如果企业能在供应链或商业模式上迅速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满足客户需求，则有可能在危机中实现超越平日的利润增长。正如尼采所言：“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加强大。”

此外，我们还应意识到，在复杂多变的决策环境中，局部最优解往往受限于信息不足、利益纠葛等多重因素，难以达到全局最优。而重大的冲击或高度不确定性事件，有时却能成为打破固有体系、推动战略转型的契机。例如，企业可能因此决

定转行、关闭亏损业务或探索全新产品线。

美国大选正是说明这一点的生动例子，特朗普在遭遇枪击事件后的冷静应对，留下一张展现了他“硬汉形象”的经典照片，瞬间扭转选情，这正是他有效利用不确定性的结果。然而，在特朗普团队看似稳固之际，拜登团队却做出重大决策——拜登宣布退出竞选，推出哈里斯参选，并选定了稳重的竞选搭档，这一系列变故仿佛又使局势发生了逆转。此前特朗普领先拜登的诸多优势，转瞬之间成为了劣势。这样的战略决策，或许在特朗普选情未变之前，拜登团队不会轻易采取。当前的选情显示，双方可能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这也再次印证了“危机中蕴含转机”的道理。

用数智化应对不确定性

另一种应对策略是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应对不确定性。这同样是源自学术界的智

慧——首先由北大国发院周其仁教授在多年前为一本畅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出，他主张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应对不确定性。近期，诺贝尔奖得主迈伦·斯科尔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以“人工智能与不确定性”为题，强调了人工智能相比传统方法能更快速地提供答案和解决方案，为个人提供定制化服务，并快速适应不确定性和新技术，从而帮助企业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保持竞争力，成为创新的驱动力。将这两位学者的思想结合，可以看到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今时代的重要性。

为什么数字化能够帮助我们应对不确定性呢？我总结了以下三个视角：

第一，信息视角。信息论的创始人香农教授曾指出：Information is that which reduces uncertainty。即信息就是用来降低不确定性的。因此，拥有更多信息就可能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数字经济和人工

智能技术使我们能够生成、记录并挖掘出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个人和企业的方方面面，形成“数字足迹”。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更高效地处理这些数据，挖掘出有用的信息，辅助商业决策，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使我们更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的冲击。

第二，灵活性和韧性视角。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往往在于决策调整的成本高昂并且存在许多不可逆的行为。而数字化技术通过新型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和韧性。通过数字化手段，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调整战略、优化流程，并快速适应市场变化，从而在不确定性中保持竞争力。

数字化技术能够显著提升个人、业务及组织的灵活性。通过引入灵活就业和柔性生产方式，我们能够显著降低调整成本。传统上，企业可能需要依赖大量固定资产，

而现在，借助灵活就业和柔性生产模式，企业能够大幅降低固定资产和库存需求，实现更快速的调整。这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加快了资产周转速度，从而增强了企业抵御不确定性冲击的韧性。例如，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义乌，涌现出众多柔性制造企业。这些企业能够按需接单，即在收到订单后再组织生产，几乎实现零库存。这种生产模式使企业能够更灵活地应对外部需求环境的变化，有效降低了市场风险。

第三，创新视角。作为自带创新基因的技术，数字化催生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数字化团队凭借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研发效率，能够迅速响应外部变化，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快速迭代。这些创新不仅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还为企业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有力支持。

综上所述，数字化技术为我们提供了

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通过提升灵活性、降低成本、增强韧性以及促进创新，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希望大家以奔跑的姿态拥抱不确定性，积极迎接数智化浪潮，共同穿越困难时刻。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宁高宁 + 黄卫伟 + 肖知兴⁹：变局时代的管理哲学与挑战应对

如何主动选择成长的环境？

王贤青¹⁰（主持人）：宁老师在《三生万物》这本书中提到了三兄弟和三老师的故事，强调了成长环境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比如家庭背景和老师我们无法选择，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成长环境。像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了通过改变居住环境来为孩子选择更好的成长氛围是可能的，黄老师刚才也提到了小环境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影响。

9. 宁高宁：华润、中粮、中化前董事长，新书《三生万物》作者。

黄卫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华为高级管理顾问。

肖知兴：领教工坊创始人。

10. 王贤青：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

请问三位老师对于如何主动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或成长环境有何建议？

宁高宁：起点和环境的不平等是长期存在的现实。未来的教育必须面对不平等，这是无法改变的。不同的老师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有着不同的影响。在众多学生中，只有少数能够真正理解和继承老师的教诲。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逐渐认识到哪些老师对自己的成长起到了关键作用。通常，那些看似不近人情、讲授枯燥内容的老师，最终被证明都是正确的。当一个人能够识别出真正对自己有影响的老师时，这标志着他的成长和成熟。

黄卫伟：在商学院任教二十余年，我始终面临一个挑战：没有企业管理经验却要教授管理课程，尤其是对 EMBA 学员。这似乎不合理，因为缺乏实际经验可能无法充分理解企业运作的复杂性。管理理论并不深奥，除了管理科学中的运筹模型外

并不难掌握。因此，我意识到作为教师，我需要深入企业的了解企业的实际运作和企业家的思考方式，不能浅尝辄止，以便更有的放矢地教学。

为此，我在人大商学院开设了一个名为“释放你的潜能”的实践项目，让学生组成团队解决企业的一个实际管理问题。此外在退休多年后我试图通过我的《管理政策》一书开设选修课程，传授基于辩证法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论。我的目标是丰富学生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提高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认为，管理教育需要根本性的改变，要紧密结合企业的挑战和变革，否则教育内容将显得空洞。

肖知兴：我认为学习最重要的就是阅读，而且中国的图书售价相对便宜，相同品质的图书，在中国卖 88 元人民币，但在

美国会卖到 88 美元甚至更高。因此，我们应该珍惜这一优势，多读书。在选择书籍时，不应只依赖成功人士的书单，而需要自己去探索，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包括质量不高的书籍，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识别出真正的好书。例如，许多企业家的传记实际上是由他人代笔，而不是他们自己写的。因此，通过广泛阅读，我们可以学会辨别书籍的优劣。

如何选择发展的城市？

王贤青：对于个人和企业的发展，选择城市也至关重要，因为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性格和资源。宁高宁老师的经历表明，不同的城市对他的成长有着显著的影响。对于年轻人来说，选择在大城市发展还是回到小乡镇是一个重要的决策。以华为为例，如果它没有选择深圳，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深圳对华为的重要性可

能与任正非对公司的影响一样关键。请问黄老师，您如何看待个人和企业在选择城市发展时的重要性？

黄卫伟：我拿华为举例子，现在看来任正非的选择对华为的发展至关重要。他曾有机会去绵阳的一个研究所担任领导，但因女儿孟晚舟的上大学问题而改变了决定，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深圳的改革开放环境与任正非的经历相契合，为华为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尽管当时包括深圳在内全国有邮电部认证的 156 家用户机通信企业，华为只是其中之一，但最终只有华为和中兴等少数企业存活下来。这表明，尽管城市环境对企业的发展有影响，但企业的成功还是取决于自身的努力。

城市对个人和企业的发展有影响，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成长经历和理念。北京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但这种资源的优越性也可能造成企业对政

治资源的依赖，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相比之下，深圳的市场环境资源促进了世界级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此外，北京的户口、购车和购房政策，可能不利于年轻人的发展，而经济活跃和前沿的城市可以提供更多机会。

宁总提到的三个城市对他的事业发展至关重要。香港的自由化、法治化和开放市场的环境，北京有政治中心和国有企业总部集中的优势，深圳的市场资源优势，三个城市都有各自的优势，也都对个人和企业的成长有着不同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在香港起家，可能无法在北京成为公务员或国企高管，而更可能在经济活跃的城市找到发展机会。

王贤青：美国和欧洲有许多世界 500 强企业起源于小镇，而中国的 500 强企业大多来自大城市。请问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肖知兴：在欧洲读博期间，我访问了许多国家和地方，包括美国的一些偏远但美丽的小镇。这些地方展示了文明的内生性，即无论地理位置如何，人们都能创造出完美的社区。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更多是受到外来影响，特别是在 1840 年之后，许多新思想和文化是从西方传入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更接近西方，更早接触到市场经济和法治思想。因此，在选择城市发展时，重要的不仅是城市的规模，而是它是否能够接受到新思想和文化的“东风”。我的观点是，选择城市时，应考虑其是否位于能够接收到这些积极影响的地区。在瑞士的偏远山区，存在着世界上最昂贵的手表制造商；在意大利的山区，有全球最昂贵的跑车公司。然而，在中国江西的山区，可能连像样的建筑或招

牌都难以找到。这种现象反映了不同地区文明发展水平的差异。

王贤青：其实西方很多创业创新是先有了原理再去生产产品，然后迈向全球市场，所以它是内生的，是从原理到产品。中国属于追赶型国家，大多数企业前期的技术主要靠引进，大城市就更容易接触和引入先进的东西，也更容易组织生产，这一点宁老师怎么看？

宁高宁：这个问题具有两面性，中国人倾向于大城市，企业一旦做大，往往会迁往北京、上海或深圳，因为这些城市似乎更能助长和体现公司的正规性和规模性。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一部分源于中国发展的不平衡，许多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文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难以支撑企业的成长。

然而，近年来，一些中小型城市也开

始孕育出优秀的企业，这些企业并没有急于迁移。当地政府也倾向于留住这些企业，不希望它们搬走。这表明，随着中国的发展，企业对于地理位置的选择正在变得更加多样化。当然也还有税收问题，大型城市的大企业多，税收来源也多，政府就不会只盯着一家企业，但小城市就不同了，也是因为这些压力所以企业也愿意选择搬去大城市。

新领导如何融入老团队？

王贤青：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企业和个人有了更多发展机会。关于新加入公司或部门的员工，尤其是空降兵，他们常面临新环境的排异反应。请问宁总，如何克服这种排异反应？在新环境中，如何快速建立个人影响力并与新团队融合？

宁高宁：在新加入公司或部门时，不能带很多新人一起入职，尤其是不能带有

职务的人，因为这可能导致新旧团队之间的对立。我在离开华润时和公司达成协议，不挖角，以减少内部矛盾。而且新加入的人如果不是一个团队，反而更容易被接纳，因为一个人是很难形成对立集团的。在这种情况下，新成员就可以迅速融入团队，并了解团队内部的矛盾和历史问题。新人的到来就像洪水一样，把老公司的坑洼全部填平了，也就是不停留在过去，以新的目标和战略重新出发。在中化工，我就面临这样的问题，刚入职就遇到了阻力，由于我是先兼职后合并的状态，员工并不充分信任我，接纳我，但随着慢慢融入这个新公司后，员工也感受到了我这个新人给他们带去了新的工作体验和生活选择，也建立了新的共同标准，甚至清除了他们业务上的阻碍，才最终赢得了团队的认可。

所以，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只要新加入一家公司，都会出现不适应的现

象，也会面对很多问题，但这只是一个过渡的过程。有一本哈佛教授琳达·希尔写的书《上任第一年》推荐给大家，这本书很适合新上任的管理者阅读，有很多指导和参考意义。

企业如何找准管理和创新的平衡？

宁高宁：在变革时期，企业管理的复杂性尤为突出。现在来说，管理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理念问题，管理和保持活力要连在一起看，要看清企业的本质。企业需要明确其本质和目标，确保每个决策都符合企业的长远利益。例如，任正非的管理哲学就始终以企业发展为核心，这与一些国企在多元化目标和社会责任中的摇摆不定形成对比。

在管理实践中，过度的管理可能导致员工积极性下降，而管理不足则可能导致混乱。所以，找到合适的管理平衡点是关键。

华润集团的成功案例表明，即使业务领域广泛，也能通过明确的原则和方法实现有效管理。这也为其他企业提供了借鉴，即在遵守基本管理规则的同时，也要培育创新文化。总之，企业管理需要在确保规则和秩序的同时，鼓励创新和自主决策，以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这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磨合，才能找到最佳的管理平衡点。

黄卫伟：在企业管理中，严格的管理和企业的活力并不矛盾，两者可以并存。以华为为例，任正非的管理理念就受到新加坡管理模式的影响，强调严格的管理，同时认识到过度的严格可能会抑制员工的活力和情绪。为了平衡这一点，华为内部建立了一个名为“心声社区”的平台，员工可以在该平台上自由发表意见，包括对公司文件、任正非的讲话、公司政策以及部门内部问题的讨论。公司也公开了高管的讲话和重要文件，除非涉及绝对机密。

任正非将这种机制称为“耗散结构”，意在为员工提供一个释放积压情绪和不同意见的渠道。这种释放是渐进的，旨在避免过快释放可能导致的不稳定。通过这种方式，即使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企业也能保持稳定。

这种管理方式体现了在严格管理的同时，为企业和员工提供释放压力和表达意见的空间，从而妥善处理看似对立的管理要素。在某些情况下，管理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管理的不当，即对应该严格管理的方面放松了控制，而对不应该过度干预的方面却施加了过多的限制。

读什么书与怎么读书？

王贤青：关于读书，其实年轻人和企业家已经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在什么阶段阅读工具书（如 MBA 课程中的财务管理书籍）或哲

学思辨性书籍（如《正义论》、《中国哲学简史》、《资本论》）？应该按阶段系统性地阅读，还是根据个人需求随机选择？

肖知兴：对于阅读，我认为应该顺其自然，爱看书的人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会抓住任何书籍来阅读。因此，不必过分依赖导师的指导，因为每个人的阅读偏好和脾性都不同。正如佛法所说，世上的修行方法各有不同，不是只有一种。他人的学习方法可能并不适合你。所以，应该广泛阅读，内容越丰富越好，这样你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阅读路径。

宁高宁：我觉得人这一生，在二三十岁时，如果能够投入一两年时间深入阅读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如《资本论》、《物种起源》、心理学的书籍或历史书籍，还要反复研读、做笔记，理解书中的逻辑和方法，这将对个人的思维和理解能力产生深远影响。选择阅读名著是因为它们蕴含

深刻的道理。通过深入研究一位作者的其他作品，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其思想。这种阅读经历可以成为理解的基础，逻辑的基础。例如，我在大学期间被迫阅读《资本论》，虽然现在可以对其理论质疑，但其逻辑性、分析性和对社会的应用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一部集智慧之大成的作品。

阅读艰涩难懂的书藉有助于建立逻辑架构，学会如何分层分析问题，理解因果关系、矛盾和度的概念。即使不能通过一本书学会所有事情，至少可以学会一种逻辑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广泛阅读是有益的，但至少有一本书能够让你学会基本的逻辑和方法。

王贤青：不一定找到“葵花宝典”或者“武林秘籍”，但是一定要找经典著作，尤其有系统思维的著作。阅读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训练思维，尤其是通过阅读教材或经典专著。肖老师建议可以随机阅读，

但也强调在两种情况下应该深入阅读：一是当书籍带来愉悦感时，因为它能提高阅读兴趣；二是当书籍带来挑战或不适时，因为这可能揭示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有助于理解他人的想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杨壮 + 刘世超 + 郎春晖 + 魏然¹¹：变局时代的战略与军事领导力

魏然：我是景铄智库的创始人魏然。我们的咨询团队已经陪伴中国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成长超过 10 年，数据库里积累了新经济各个象限高管的数据，所以就衍生出了“景铄智库”。智库中的所有专家都通过多年的接触和筛选。这些能被称为行业专家的人，不仅仅具备极高的商业赋能价值，他们的品格以及对社会层面贡献的意愿都是经过验证的。今天，我们不仅邀请了创始人，政策专家，投资人，我们也同

11. 杨壮：北大国发院管理学教授、国发院 BiMBA 商学院前联席院长。

刘世超：溪木源创始人。

郎春晖：创新工场合伙人。

魏然：景铄智库创始人。

时邀请了智库的几位行业专家参与论坛，共同发声，建言献策。

这场论坛的主题是变局时代的战略与军事领导力。大家知道军事领导力是个广泛的概念，它在企业中的应用需精心挑选，不能简单套用大框架。

因此我的第一个问题想请问三位嘉宾，针对当前中国企业包括创业企业，特别是面对80后、90后的CEO和首席人力资源官（CHO），您认为有哪些军事领导力的理念是他们能迅速借鉴并能有效实施的？

杨壮: 2004年我与西点军校建立联系，与此同时，我的同事胡大源老师则在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和经典战役如四渡赤水。我们发现，尽管军事领导力跨越国界，但其中蕴含着共通之处。

军事领导力对人的深刻影响，尤其体

现在执行力上。第一代企业家中那些能成功坚持下来的人，如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和王健林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曾在军队中服役，这赋予了他们底线意识和上限思维，在关键时刻知道如何行动，具备自我约束能力和强大的自驱力。

西点军校也有同样的成果，它在战后培养出的 CEO 和企业家数量甚至超过哈佛商学院。西点专注于本科生的领导力培养，而且课程精简为管理、领导力等核心科目，甚至连财务课程都没有。在西点军校，开学典礼就是一场考验，约 5% 的学生会因无法承受压力而离开。包含严厉训斥在内的高强度身心训练，正是为了筛选出心理强大、适合当领导的人才。有趣的是，在硅谷等地，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常能成为企业创始人，这与他们在军校中经历过严苛的训练和考验，进而培养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的领导力不无关系。

具体到企业组织，军事领导力是通过培训还是招聘来实现，二者哪个更重要，不同的人看法可能并不相同。但是，西点军校的实践显然证明，严格训练和领导力培养非常重要。

郎春晖：我认为招聘更重要，因为好学生是挑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杨壮：从这个角度来看，的确如此。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些人即便老师给予不多，也能展现出强烈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他们或许并不绝顶聪明，但是拥有独特的悟性，具备企业家所需的多种特质。这些特质匹配好的商学院环境，会迅速闪耀并脱颖而出。在缺乏这些特质的人身上进行相同的训练，从领导力提升效果来讲，最终可能收效甚微。企业尤其要考虑到经济效益，当然要更看重招聘，否则人招进来后花费很多精力和金钱去培养，发现可能仍难以达成岗位目标。

近年来商学院兴起的戈壁挑战赛，参赛者原本可能只是出于好奇，但通过跑步和锻炼，大家惊讶地发现，那些在军队里经受过严格训练、有过磨难经历的人，面对这类挑战时显得格外从容和自信。

上述几件事好像各不相同，但其实有共同点，那就是军队训练对个人成长有深远影响，这包括身体素质、团队精神等多个方面。

纵观他们的职业生涯，我再分享两点观察：

首先，据我所知，西点军校领导力专业的军官中，有人退休后并未如外界所传成为咨询师，而是加入耶鲁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等顶尖学府讲授领导力。

其次，西点军校不少毕业生最终选择硅谷作为创业舞台，他们或许不是技术专家，但凭借在军校培养出的团队精神与领

导力，他们在创业路上同样大放异彩。

魏然：谢谢杨老师。接下来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自主创业的企业家，一位是多年陪伴创业者成长的投资人。关于如何将军事领导力融入组织内部，包括如何培养危机意识、建立深厚信任、为基层赋能以及提升行动力等方面，无论是宝贵的经验还是深刻的教训，两位有哪些分享？

刘世超：我们公司不足之处很多，但是有两个方面表现不错。

第一，作为一家融资活跃的企业，我们在24个月内完成了7轮融资，筹集了数千万美元，成功创造了数万就业岗位。尽管我们刚开业不久就遭遇疫情，但美元基金投资本就是一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博弈，他们愿意一起承担风险，这比国内有些资金要好，因此，资金的性质远比其数额重要得多。

第二，关于军事领导力在企业中的应用，如《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言：“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翻译过来就是说，用兵的上策是用计谋战胜敌人，其次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再次是出兵打击敌人，下策是攻打城池。孙子主张以智胜敌而不是以力胜敌，认为策略、外交很重要，所谓谋定而后动。

《孙子兵法》的原话是“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意思是谋划准备周到而后行动，知道在合适的时机收手，才会有所收获。结合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尤其是西方管理学智慧，我认为“谋定而后动”重在战略先行。迈克尔·波特指出，战略就是选择不做什么。在我们每五年召开一次的战略会议上，我总是首先强调这一点。

人们天生喜欢尝试新事物、追求得到更多，但是逃避困难。这是人性使然，问题是对于一个组织而言，一味追求新奇或

数量，包括频繁增减人员、随意上新产品，往往效果不佳，也缺乏实际意义。“谋定而后动”强调行动前要有周密的计划和考虑，因此我在组织内部反复说“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善医者通盘无妙手”。真正的高手不在于偶尔出奇制胜，而在于其稳健性和全局观。我们总爱赞赏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故事中的智慧，觉得那是天才之举，可是在我看来那种瞬间闪耀并不是真聪明和大智慧。

历史上像韩信这样的军事天才为什么那么罕见？他们擅长指挥大军。比如中国在解放战争时期有三大战役，其中两场是林彪指挥的，都是高难度的战斗，在那种规模下打不打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后勤——士兵能不能吃饱、粮草能否及时送达、装备是否充足。现在很多中国企业也容易犯贪多求全的毛病，但懂得取舍才是关键。战略的第一步，往往就是明确哪些

事情不该做。

以我们自身为例。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亚洲第一，同时明确产品和品牌是核心，为此我们拒绝走捷径，选择自主研发。公司曾经推出一款很好的产品，但是后来因为政策原因必须停产，这时有投资人建议我们快速推出替代品，与原产品外观、包装一模一样，而且只需三个月。我们拒绝了 this 诱惑，选择重新做研发。最终，新产品耗时一年多才问世，这个过程中有些老顾客可能已流失，短期看来这么做很不合理，但是符合我们坚持品质与创新的长期战略。

当我们全公司都坚守这个原则时，它竟激发出一股奇妙的力量：新产品一经推出，就在天猫年度回购榜上跃居首位，超越那些有七、八年甚至十年历史的品牌。这种以终为始的坚持异常艰难，也离不开深刻的洞察，因为盲目坚持也不可取。当然，

深刻的洞察同样不容易获得，需要不断探索与积累。

魏然：基于刘总上面说的，能感觉到你的战略定力，但遇到股东给压力的时候怎么说服他们？

刘世超：懂得拒绝，这在合作过程中同样重要，它会赋予未来更大的主动权。

在接受投资的过程中，我曾面临两家公司的激烈竞价，其中一家出价 2 亿美元，另一家紧随其后出价 2.5 亿，第一家又直接提高到 3 亿。我自知这样的高价并不符合我们的实际价值，于是我提议双方以各自出价的 70% 成为我们的投资人，这样我不仅比原估值高，投资双方也节省了开支，实现共赢。在这样的条件下，确保投资条款对企业发展有利，就相对要容易一些。公平的投资比例是合作愉快的基础，最终两位股东欣然接受方案。我举这个例子关

键是想说，我们是抵挡住了高价诱惑，才得以掌握更多主动权。

当然，对投资人的态度要非常积极，结果也要对投资人有利。目前，我们的投资人不仅从账面价值上获得了回报，有些还实现了收益翻倍甚至更多。我始终认为，要让投资人继续支持，就必须确保他们真正赚到钱，这是最直观的共赢。我们的态度或许可以有调整空间，但核心不能变，那就是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资本赋能后的价值。

郎春晖：我的观点与你谋而合。在创新工场工作的这 14 年里，我见证它从筹备到如今的成长过程。作为创新工场的第一名员工，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所有投资决策流程和投资文件模板，迄今已参与 90 家公司的投资，目前正全力负责退出工作。因为我们已投资了 35 亿美金，在如今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如何有效回收这些资金，

是创新工场的重要任务。由于我深谙每位CEO的背景和历程，就主动承担起了这份责任。

在退出过程中，我始终秉持一个原则：不与创业者为敌。我们的角色定位也决定了这一点。在2017年之前，创新工场作为众多项目的首轮投资人，更多地是扮演支持者和引导者的角色，与创业者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推动项目成功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大多数创业者能与我们携手走到终点，这让我倍感自豪。比如，在苏州的一次董事会，CEO热情地称我为“干妈”，因为他深知我们给予的巨大帮助。甚至在并购后，这位创始人还特地发来微信说我应该叫你“亲妈”。这证明真心帮助创业者，一定会收获他们的真挚回报。

魏然：郎总您与众多创业者交流过，

在您看来To B和To C领域的创始人，在领导力方面最显著的区别是什么？

郎春晖：做 To B 和 To C 业务的人很容易区分，因为差别特别大。

做 To C 的人，很多都是产品主导，他们对人性的理解非常深刻，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用户，但很多时候他们的组织能力相对较弱，因为 To C 产品推广更像是用轰炸机、大炮这样的远程武器触达用户，不太需要复杂的地面组织。

做 To B 的人则是渠道导向，组织能力很强，这里的渠道既包括外部，也包括内部。

有些人觉得现在 To C 不火了就转做 To B，鉴于上述差异，我想说这并不容易。如果想转做 To B 的公司，我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去大外企挖高管。

刘世超：最好是曾在外企工作过，并

且在民营企业有至少一年半经验的人，即使这段经历包含失败也没关系，因为这样的人才反而更能感知和应对各种挑战。

郎春晖：对，有过失败经历的反而更好。

杨壮：西点特别注重培养 18 岁青年多方面的能力，包括有明确的哲学观和人生理想，入学者需获得当地参议员推荐，竞争非常激烈。这实际是在筛选具备领导力潜质的青年。

领导力同时也是个人独特且正面品质的集合，正如我身旁两位管理者，他们在分享中各有其显著特质：刘总分享的决策智慧，是多年实践中的宝贵心得，也反映了其作为领导者的综合能力和价值观，而郎总突出的利他精神，正如稻盛和夫所言，最高级的利己其实是利他，因为极端利己者往往在关键时刻孤立无援。在商业竞争中，也应避免将对手逼入绝境，否则自己

也可能陷入困境。中国企业的众多实例，都印证了这一点。

前面也提到，西点军校入学首日就是对学员的全面考验，有十多项高强度测试，模拟极端环境，旨在筛选出能承受压力、具备坚韧品质的学员。整个过程严肃且充满挑战，意在明确告知每位学员：若无足够的准备和素质，将难以适应这里的训练。毕竟，那些从小缺乏磨砺的人，很难坚持到底。

我有学生就参与过彩排，深感震撼。它模拟了从16岁到70岁各年龄段人群被审视的过程，全程只能用英语交流。学生们虽能听懂问题，但紧张之下往往思维混乱，无法做出快速而准确的回应。我记得有一位女同学被命令“drop your bag”，教官喊了七次，一次比一次声音大，我也在远处喊，她最终才扔掉包。显然巨大的压力让人不知所措，也反映出日常我们缺

乏此类训练。当天，千人中有5%选择退出，测试之严苛可见一斑。

我带领的学员们经过一天的体验同样备受打击，他们甚至提议取消后续行程。分享感悟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认为这种“骂”有价值，一方面反思为什么在中国的环境里，国内企业和学校都不可能借鉴西点模式。大家感慨不已，深感这不仅是一种身体训练，更是一种精神磨砺。

在西点随后6周的综合素质训练中，又有5%的学生因各种原因离开。能继续进行学习和训练的人，接下来4年间，学校会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包括作弊，但3次为限。这种既给机会又严明纪律的机制，有效提升了毕业生的整体素质，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群体性优异。

最后补充刘总刚才谈到洞察的重要性，结合西点领导力培养的特质，我认为洞察

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深入理解人性，二是敏锐捕捉趋势。如果我们能真正把握好这两点，自然能少走弯路。

刘世超：我还有一种人性发现，就是最近我见到安克创新的创始人阳萌，发现他非常坚持正道，这种独特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人的天性中还常有贪欲和追求名利的倾向，始终守住正道非常难得。

魏然：就像商学院常提倡选择时做减法，但实际上这样做的人并不多。

刘世超：看到聚光灯就想靠近，见到好房子和财富就心生向往。一个企业家能否坚守正道，本质上取决于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郎春晖：的确，个人的命运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选择。

魏然：由奢入俭难是非常朴素的道理，

如今创业者资金紧张，就得“勒紧裤腰带”加倍努力，学着强化供应链、下苦功掌握核心技能，单靠追逐流量和估值是行不通的。我们判断创业者的潜力，也常会看其在困境中的态度以及是否有长远规划。

我跟刘世超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单靠招人来改变公司基因或提升组织能力是不够的。郎春晖说招人比培训人更重要，但并非什么问题都能通过招人解决，企业还得了解自身，评估能否容纳想要的人才。

就此，我想追问刘世超，作为企业负责人，您怎样看待和留用有优质企业从业经历的人才，比如：很多公司在学华为，他们在学华为的什么？

刘世超：我们的原则是，尽量不招在华为工作超过五年的员工。华为无疑是一家优秀的企业，但是正如郎总所言，它拥

有强烈的 To B 基因，极其注重渠道和服从性，我们身处 To C 行业，更强调创新和美学。而且创造力和容错率成正比，容错空间越大，创造力往往越高。相比之下，华为的容错率是比较低的，因此我推测在华为适应得比较好的员工，可能未必适合我们的环境。这里我并不是否定华为人才的能力，而是担心他们在 To B 领域表现出色，来了以后由于环境适应性问题很短时间便离职，这对他们和我们都不利。

郎春晖：二者的风格差异可能还和公司文化或“基因”有关。比如苹果虽是 To C 性质的企业，但它在某些方面与华为很相似，员工像螺丝钉一样各司其职，相比之下，谷歌则截然不同，它鼓励员工释放个性，甚至允许员工五个工作日里有一天可以自由做喜欢的事。

刘世超：从组织机制来讲，我们组织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信任和授权，其结果是

我们在两个方面和华为不谋而合：

一是内部股权自由流动，以四年前愿意降低薪酬加入我们的一位同事为例，最近我们回购了他的少部分股份，并给予 50 万元现金作为回报。正如杨老师刚才提到的分享精神，我们公司有近 15% 的员工持有股份，并且我们会回购这些股份。这意味着无论公司是否上市，这些股份都有很高的价值。这是我们与华为的一点相似之处。

二是靠创新脱颖而出。我 2006 年进入护肤品行业，2015 年还曾担任某国产品牌的 CEO。那时我发现，很多老一代护肤品的主要功能不外乎补水、保湿，抗皱成分微乎其微，配方和香精也大部分是代工生产的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模式。2021 年行业新规出台，要求宣传有美白、抗衰老等功效的产品，必须提供真实的人体实验数据。这对我们

而言是件大好事，因为我们提前两年就已经着手布局这件事。最终，我们凭借原创与品质赢得市场认可并脱颖而出。对很多公司而言这却如同一场噩梦，因为新规的出台使其成本增加、销量下滑，最终发展难以为继。研发需要时间才能见到成效，即便2021年融资环境相比现在要好很多，投资人偏爱短期见效、盈利快速的特点仍未改变，而这恰是坚持创新企业的巨大挑战。



04.

承泽精选

编者按：

本期“承泽精选”栏目共呈现三篇文章。

第一篇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强调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和比较优势上的可行性。



第二篇文章为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对如何提升中国金融国际影响力的阐述。除了加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连接，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黄益平教授特别提出了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的倡议。该“计划”可视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目的是借助中国的新能源产品优势，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这将有助于直接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推进金融机构和人民币的国际化。

在今年9月的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外滩全体大会暨开幕式上，美国第70任财政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展开对话。



两位专家围绕美国经济前景、美联储货币政策、美国财政压力、人工智能发展、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等重点问题分享了各自的卓见并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栏目的第三篇文章是这场国际对话的实录。这场对话也是鲁宾与黄益平第五次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交流。

林毅夫：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长期优势

黄益平：如何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

罗伯特·鲁宾对话黄益平：美国大选与中美经济关系



林毅夫¹²：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存在长期优势

近几年，中国股市低迷，民间投资受到影响，居民消费也显得较为疲软。再加上国外各种“中国经济见顶论”“中国经济崩溃论”盛行，大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多少有些担忧。

但我认为上述都是短期问题。总的来讲，主要是信心不足。面对信心不足，我国有非常充分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空间，我想这是国内学界的共识，只要把这些政策用好，我们应该可以稳定

12. 林毅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信心，经济也能恢复正常增长。

2024年9月24日新闻发布会上，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证监会主席吴清、金融监管总局局长李云泽的政策介绍，加上9月26日政治局会议制定的一系列措施，大家的信心已经明显恢复，股票市场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我相信经济的止跌回升是可以预期的。

对我们国家来讲，重要的还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因为我们要实现的目标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长期经济增长来讲，最重要的是生产力水平要不断提高。怎么样才能让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呢？最重要的就是现有的产业必须不断技术创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必须不断涌现。这就是去年以来谈得非常多的依靠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从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讲，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机会，因为对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科技等，首先我们跟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跟其他国家比我国有三大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人才优势。大家知道，我们每年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STEM）毕业生的数量超500万。

第二个优势是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技术创新或者新产业的出现靠国内大市场可以马上达到规模经济，快速在国内国际市场上拥有很大竞争力。

第三个优势是我国有最完整的制造业生态，任何产品、任何技术如果要硬件，我们国内是最齐全的，成本可以是最底的，质量也可以是最高的。这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软件，美国现在下载量最大的

几个软件都是中国企业拥有的，如拼多多在美国的一个平台叫 Temu，还有抖音、剪映、希音等。从硬件来看，比如特斯拉在美国发展了十几年，它最高产量也不到3万辆，一度面临困境。2019年到中国投资，2020年就生产了48万辆，让特斯拉变成现在市场估值达到6000亿美元的最大汽车公司。另外，国内电动汽车、无人机、太阳能板、锂电池，这些新兴产业的优势已经显现出来。

当然，我们绝大多数产业还是在传统产业领域。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不少国际领先，比如高铁、家用电器、造船等。其他尚未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仍处于追赶阶段的传统产业，我们有后来者优势。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利用引进、消化、吸收作为再创新的方式，这种方式风险成本会比较低，这也是一个优势。同时，这些传统产业也可以利用数字化改造、人工智能制

造来实现换道超车。最明显的就是电动汽车，原来的燃油汽车产业我们长期处于追赶，现在经过数字化、人工智能和电动化，我们的电动汽车已经在国际上领先。从上述优势来讲，我们在传统产业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非常大。

不管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都很好，但是，也要防止一拥而起、一哄而上。怎样才能防止呢？最重要的是各地要因地制宜，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共同作用之下，把各地的比较优势发展成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总的来讲，我国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还有一些中西部的中心城市，像武汉、成都、西安，这些地方经济发达、资本丰富、人才又多，可以在新兴产业上多下点儿功夫。中西部其他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它的比较优势主要还是在传统产业，可以多利用数字化、人工智能，以及引进、消化、吸收，

来实现从追赶型产业变成领先型产业。

总的来讲，当前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国际形势，来自外部的打压会不断增加，国内也一定会有一些短期的结构调整引发的波动，包括有效需求不足。但总的来讲，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从短期来看，我们有足够大的政策空间使经济稳定向好。从长期来讲，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不管是新兴产业还是传统产业都存在许多优势，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把这些优势发挥出来，我国经济一定能够继续维持中高速增长，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黄益平¹³：如何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¹⁴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对未来的金融工作构筑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同时金融强国建设也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强国包括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和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六大元素。直观地理解，金融强国起码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即高效、稳健、国际影响力。前两个特征比较直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13. 黄益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14. 此为缩减版，注释从略，全文可在知网下载：<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799.f.20240716.1352.002.html>。

提出了明确的举措，即“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与提升金融的国际影响力相关，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制度型开放，高度重视经济与金融的安全性，同时积极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

一、与国际金融市场连接

客观地说，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提升面临一系列的制约条件。

首先，中国的金融发展道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兼具中国特色。发展至今，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中国需要考虑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问题。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从 1978 年的一家金融机构开始，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建成了一个庞大、完整的金融体系。与大多数市场化国家的金融体系相比，中国的金

融体系确实有不少独特之处，比如政府参与的程度和国有金融机构的占比都相对较高。截至目前，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效果优于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如果要总结一条有益的经验，那就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务实态度。这种改革的务实态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实际出发，重视改革政策的可行性；二是以结果为导向，如果改革措施有效，就继续往前走，如果效果不好，宁可往回退一步。这样，一方面，金融体系的演变总体上来说是有有效的；另一方面，在演变过程中难免留下甚至产生一些问题，所以持续改革是必要的。

这样一套在国内行之有效的体系如何与国际市场制度接轨？归根到底，金融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的机构、产品和投资者能够“走出去”，国外的机构、产品和投资者可以“引进来”。这就要求国际、国内两套体系能够无缝衔接，国际市场参

与者不但要能够理解国内的体系，还要有充分的信心。

其次，目前看来，中国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如果资本不能自由进出，那么就很难讨论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在 1996 年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下的可兑换，之后一直努力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下的可兑换，但迄今尚未大功告成。事实上，2017 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提出要稳健地推进资本项目的放开，其间经历新冠疫情、大国关系、地缘政治等外在冲击后，2023 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经济与金融的安全性。实际上，这个变化是务实政策的体现。与所有金融政策一样，资本项目放开既有积极效应，也会有负面后果。前者主要是资金利用效率的提升，后者则指资本大进大出，容易导致金融不稳定。许多发展中国家就是因为过早放开资本项目而酿成了严重金融危机。

中国目前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条件尚不成熟，决定放缓这项改革，是很明智的。

资本项目暂时不放开，势必会影响金融的国际影响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可以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向前推进。第一，资本项目不放开，并不影响金融服务业的双向开放。国内的机构“走出去”、国外的机构“引进来”，最近几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显著，外资金融机构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更多的牌照，还在一些业务领域被允许 100% 控股境内金融机构。第二，虽然一些敏感的资本交易项目不能放开，但其他项目可以基本放开甚至完全放开，比如长期国债的投资，中国还设置了一些管道式的开放渠道，比如沪港通、债券通等。第三，在资本项目不能完全放开的前提下，仍然可以通过发挥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央行的货币互换协议的作用，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

开放的主要功能是让“非居民”可以自由地交易、持有人民币资产，当前离岸市场可以部分发挥同样的功能。

二、发挥中国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

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是一件典型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放眼全球，最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括伦敦、纽约、中国香港、新加坡，其他国家也在作出各种努力，日本、韩国、德国都试图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应该说，东京、首尔、法兰克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离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尚存在很大的距离。英国、美国的金融体系被称为资本市场主导型，而德国、日本的金融体系则被称为商业银行主导型。同为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国家”，为什么英美与德日的金融体系差异这么大？决定因素可能很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市场制度，包括法律体系、

监管体制、文化传统及通用语言等。既有研究也指出，英美的普通法系被认为更有利于促进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采用普通法系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已有地位可能与之相关。同样，最近兴起的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基本上全盘照搬了英国的法律体系、监管框架及语言体系。

作为一个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香港在中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将继续发挥并巩固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的其他城市也应增强自身国际金融功能，不过需要认识到真正建成高效的国际金融中心尚需投入和时日。必须指出的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是“国际”，而非“金融”。金融业务量大，肯定是重要的金融中心的指征之一，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具备至少以下三个条件：一是金融中心的资产价格与国

际市场完全一致；二是金融产品可以完全自由地在金融中心或国际市场交易；三是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决定在金融中心或者国际市场提供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间，中国香港一直很好地发挥了世界与中国之间金融与贸易服务中介的作用。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通过中国香港来到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的投资也经过中国香港走向世界，一些企业到香港市场融资，一些投资机构也到香港市场投资。这个功能应该还可以继续保持，此外还有很多新的功能可以挖掘，比如中国香港可以作为中国家户财富管理的中心，投资世界各国的金融资产；中国香港也可以作为中国金融资产交易的市场，为世界各国的投资者提供交易场所。

在资本项目短期不可能完全放开的条件下，应考虑把中国香港做成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国香港的许多金融资产可

以人民币计价进行交易。这样，虽然“非居民”即国际投资者不能完全自由地进出中国内地资本市场，但是它们可以在中国香港市场上自由地交易和持有人民币资产。这就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关键助力。

简而言之，中国香港应该发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同时应该成为全世界除了中国内地以外最大的人民币资产交易市场。

三、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政府也可以采取一些具体、务实的举措，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目前有一个值得考虑的思路是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提出这个思路的起点是关于中国“新三样”新能源产品（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的国内庞大供给能力与国外市

场需求缺口的匹配。国际市场的形势很复杂，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有需求也有购买力，但出于地缘政治甚至国内政治的原因，已经开始对中国产品出口设置限制。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新能源产品来实现绿色转型和低碳增长的目标，但缺技术、缺产品、缺资金。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测算，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投资的资金缺口为每年4万亿美元。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资金瓶颈，也许把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出口到这些有需求的国家，是一个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初衷，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当然欧洲国家自己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这个计划起码达到以下三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帮助欧洲经济复苏；

二是扩大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元的国际影响力；三是形成对苏联东欧经济区的对抗。

把上述思路借用到当前新能源领域，可以形成中国版“计划”，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这个“计划”起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庞大的贸易顺差，并且对大约170个国家存在顺差。过去中国是小国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里，持续顺差的矛盾没有那么突出。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大国经济，而且全球化的环境也发生了逆转。各国接受中国顺差的意愿和能力都显著下降。历史上也有不少因贸易不平衡造成严重冲突的例子，而处理得好的大多是将顺差作为投资或援助留在逆差国家，换句话说，即构建经济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思考“计划”的一个重要动机。

第二，零碳增长是全球任务，但是发

展中国家缺乏有效转型的能力。如果中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那么不但可以展现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中的领导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而且能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在地缘政治矛盾突出、欧美对中国实施实质性的“局部脱钩”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与政治意义。

第三，“计划”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商业化投资、低息贷款和援助的同时，可以带动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和企业“走出去”，实现合作共赢，支持中国的新能源产业持续走在国际前列。中国在“新三样”市场的国际领先地位来之不易，如果听任欧美打压，势必会损害行业发展，甚至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而通过服务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不仅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帮助中国产业保持领先地位。

第四，“计划”可以直接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推进金融机构和人民币

的国际化。“计划”的资金可以来自多个渠道，一部分可以来自商业化的机构，包括银行的贷款和企业的投资，这部分资金应该按照商业化的原则运作。另一部分来自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相对优惠条件下的长期融资。还有一部分可以是政府提供的援助。“计划”还可以考虑一些新的金融创新工具，比如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e-CNY），以“计划”为载体，走向国际市场。

“计划”对于商业化工具、政策性工具和援助工具的使用，需要秉持两条原则：一是市场化工具一定要做到商业可持续，按市场原则融资或投资决策，充分评估金融风险，同时要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债权人合作，形成有效的风险处置机制。二是政策性工具或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有政治考量，带有很强的政府行为的色彩。对

于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通过增加中央政府债务的方式实施“计划”的想法，肯定会有人持反对意见。不过需要考虑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公共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8%，适当增加一些负债实施“计划”，既不会造成财政风险，也是一种增加总需求的财政扩张举措，又有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意义，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四、小结

国际影响力是金融强国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在目前的制度与政策安排下，提升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确实存在不少障碍。本文提出了如下三条建议：第一，努力让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道路与国际市场制度接轨，同时利用人民币离岸市场和货币互换协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第二，坚持“一国两制”，保持并增强中国香港的

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服务中国的金融强国建设。第三，近期可以考虑通过设置“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以商业化工具、政策性工具和援助工具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其绿色转型，实现合作共赢，同时塑造中国在全球绿色发展中的领导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罗伯特·鲁宾¹⁵ 对话黄益平¹⁶：美国大选与中美经济关系

关于美国经济形势

黄益平：我们先来谈美国经济。去年5月，金融四十人论坛代表团访问美国并拜访了位于华盛顿的美联储办公室。当时，美联储的人告诉我们，美国可能会经历温和衰退，他们还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不同意这一判断。几个月后，衰退风险似乎消退了，我们以为美国经济表现不错。但

15. 罗伯特·鲁宾 (Robert Rubin)：美国财政部第70任部长、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名誉联席主席。

16. 黄益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约一个月前，美国股市出现震荡，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双双下挫，国际股市也遭到波及，人们开始担心美国的实体经济是否出了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对美国经济形势有何看法？

罗伯特·鲁宾：我认为那只是暂时性的市场事件，美国经济依然维持着增长势头，但增速有所放缓。我认为，尽管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美国大概率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如果最终能实现软着陆，那无疑是理想的。事实上，人们经常谈论软着陆，但软着陆却很少实现。

黄益平：所以在你看来，美国实体经济的表现依然不错，对吗？

罗伯特·鲁宾：是的，还不错。不能说很好，但尚可。

关于美联储政策

黄益平：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政策议题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也在密切跟踪。对美联储本轮紧缩周期和可能的政策宽松有很多讨论，我们一直预期美联储会开启宽松政策，但预期尚未兑现。一位投资者告诉我，美股下跌的原因之一就是美联储没有降息，我不确定你预期美联储会怎么做，但8月底，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发表高调演讲，阐释了美联储的想法、思路和政策逻辑，看起来，我们可能不久后就会看到美联储启动货币宽松。你如何评估美联储在疫情期间以及当前采取的政策行动？对未来政策有何预期？

罗伯特·鲁宾：随着疫情的好转，美国开始出现通胀，当时处境比较困难，因为一方面，美国经济没有陷入非常严峻的危机，但另一方面，通胀却超出了合意水

平。我认为美联储的行动有些迟缓，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行动了，而且我认为自那以后他们做得很好。如果是我，接下来我可能会小幅降息，比如降息 25 个基点。那之后的政策，就结合未来数据再做决定。我猜美联储会这么做，但不确定。

黄益平：包括美国国内以及其他国家，都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指责美联储加息行动可能过晚。尤其是在 2021 年，当时通胀迅速攀升。我记得鲍威尔曾说，本轮通胀很快就会过去，所以不必过于担心。从现在来看，这是否产生了一定的后果？还是说美联储已经彻底追上来了？

罗伯特·鲁宾：是的，鲍威尔当时用“暂时性”（transitory）这个词来形容通胀，我认为这确实不够明智。我很欣赏鲍威尔，他工作做得很好，但如果我是他，我不会那么说。这也不是马后炮，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不过，我认为美联储现在已经很

稳了，我对他们很放心。

黄益平：那现在（的市场波动）是怎么回事？

罗伯特·鲁宾：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刚才我也说到，美国经济依然维持着合理的增长，增速确实在放缓，但我认为美联储整体的做法没错。不久后美联储即将召开下一次议息会议，尽管不确定，但我猜测9月会降息25个基点，如果我是美联储，我就会这么做。

黄益平：如果美联储能更早加息，通胀就会更早回落。现在，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略低于3%，正在向目标水平靠拢，但通胀回落得比一些人希望的更晚，因此生活成本可能有所攀升，因为物价在回落之前已经上涨了一段时间。换言之，美联储反应迟缓是导致价格水平相对更高的原因，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罗伯特·鲁宾：我认为价格上涨有很多原因，比如供给侧冲击，资产管理公司Lazard首席执行官彼得·奥扎格告诉我，他向布鲁金斯学会提交了一篇合著论文，我没有自己去读，但他告诉我，论文认为供给侧冲击是推高通胀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你所言，美联储确实行动迟缓，但还有其他因素，比如疫情期间消费受到限制、导致了储蓄的累积，而累积储蓄的释放也推高了通胀。多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导致美国物价攀升。

黄益平：无论是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美国经济一直有一个特点，我认为也是其优势，这个优势是中国所不具备的——2019年，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都非常强劲，有人甚至认为，疫情期间，其表现进一步改善，这也是疫情结束后美国消费非常旺盛、经济走强的原因。但这与另一个政策因素有关，即财政政策，我想

这是你更关心的话题。我们都记得您担任财长期间，最大的成就之一就是迅速平衡了预算。

罗伯特·鲁宾：益平，我想说，如果克林顿总统在这里，他会说，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我们是一起为之努力。

关于美国财政政策

黄益平：好的，总之，当时美国实现了预算平衡。但不久后，债务再次扩张，我想请你谈谈你对财政方面的评估或看法。我认为美国政府在次贷危机和疫情期间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应对措施，这很合理，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同，如果你想结束货币政策扩张，那你就解除宽松或者降息；对于财政政策来说，政府当然可以缩减财政扩张的幅度，但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已经非常高，据我所知大约在 125%。

罗伯特·鲁宾：不，益平，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联邦政府当前的公共债务约占 GDP 的 100%。

黄益平：100%。好的。其实我的数据是早上刚搜来的，看来是错误信源。

罗伯特·鲁宾：不，你看到的信源展示的是债务总额，包括社保信托基金的债务，但这部分钱是政府自己欠自己的。

黄益平：好的，我明白了。但即使是 100%，有时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对吧？我们经常看到美国需要取消债务上限，这会产生巨大的政治代价。你如何看待美国未来的财政轨迹？尽管财政赤字可以减少，但债务率很难下降。有人认为，以美国经济的实力，联邦政府实际上可以永远增加债务，我相信你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你对美国经济的财政前景有何展望？

罗伯特·鲁宾：我觉得你说得很对，

美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未来 10 年，美国的债务率将从目前的 100% 升至 120%，但我认为大多数现实的估测比这个数字还要高不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就不多说了。

但我认为，120% 的估测没有充分考虑到可能会导致债务率攀升的各方面因素，包括利息成本、国防支出和气候适应的成本等。美国经济足够强大，所以有能力应对债务挑战，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增税、通过医疗改革降低联邦政府医疗保障项目的成本、通过削减福利支出来控制开支等，问题在于政治阻力，这就很棘手。我认为你说得很对，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现在的政治环境不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黄益平：我记得经合组织曾提出过一套粗略的财政约束规则，即财政赤字不应超过 GDP 的 3%，同时公共债务不应超过 GDP 的 60%。你认为这样的规则有意义吗？

罗伯特·鲁宾：你说的可能是一些经济体内部实施的财政约束规则，但我认为这个标准看起来很武断，意义不大。我认为你是对的，美国有着严峻的财政问题，但我们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可以予以应对，财政压力不会对美国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害，而是可以继续维持良好的经济增长。但这在政治上确实很难推进，至少现在很难，政治环境并不好。纵观美国经济历史，包括你说到的克林顿总统时期，至少过去，我们总是能迎难而上、克服挑战，尽管这可能需要时间。我相信，这次也将如此，美国大概率能应对财政挑战。但是，正如你所说，债务无疑是一个问题。

关于美国总统大选

黄益平：下面我们来谈谈另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美国总统大选。我们一直怀着激动但也紧张的心情关注着。

罗伯特·鲁宾：我也是。

黄益平：我们看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拜登变成了哈里斯。我记得我们今年四月见面的时候，你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对我表达的意思大致是，如果特朗普重新当选，可能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倒退。当然，你转述的原话可能不是这么说的。

罗伯特·鲁宾：原话是，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将构成自美国建国以来除南北战争时期外最严峻的威胁。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我认为，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确实将为美国经济和社会，以及国际社会带来多重风险。

黄益平：至于民主党候选人，我们对卡马拉·哈里斯知之甚少，她突然入局，从民调和她竞选团队的筹资情况来看，哈里斯目前的表现还不错。你怎么看待哈里斯？如果哈里斯当选，你认为她能胜任这

份工作吗？此外，哈里斯的经济政策是否会与拜登政府的现行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罗伯特·鲁宾：我只见过哈里斯一次，所以我对她不太熟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中有四位参与经济工作，我和其中三人很熟，第四位我不认识。他们对她评价很好，他们说她很有想法，善于学习、善于倾听、善于权衡，所以我对她印象很好。但竞选之路还很艰难。

至于与拜登政府的对比，我们首先要明确哈里斯的经济方案，正如我前面所说，我熟悉她经纪团队四个人中的三位，也认识一些和这个团队打交道的外部人士，我的整体感觉是积极的。在经济问题上，我对哈里斯印象很好，但她首先要明确经济方案，无论是现在还是大选后。而大选本身还未落定，竞选之路尚且艰难。

黄益平：如果哈里斯当选，是不是有

很大概率大多数现行经济政策将延续下去？还是说你无法确定？

罗伯特·鲁宾：我无法断言，但哈里斯首先需要明确未来她想做什么。过去一些有效的政策有她的参与，她周围的人都对她赞不绝口。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

黄益平：了解。她参与了现行政策的制定，而且你认为现行政策大体上是有效的。然而，有一项政策我们并不特别确定，那就是美国的对华政策。特朗普政府大幅提高关税、加剧贸易冲突，我们经济学家往往认为这只会适得其反，从出口数据来看，特别是如果把中国对美国的间接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其实美国的关税壁垒对中国对美整体出口的影响非常有限。

我不确定的是，这种状况是暂时性的

还是会持续下去。但老实说，尽管美国政府说，“我们不想脱钩，我们只是要去风险”，但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看，“去风险”与“脱钩”并无太大区别。关税、小院高墙政策等未来的潜在风险，对经济活动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冲击，可能也损害着中国人民乃至全球人民的福利，这些政策真的对美国人民有利吗？制造业就业真的回流了吗？关税是否提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成本？

罗伯特·鲁宾：不代表美国政府或任何其他人，我的个人观点是，美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有其合理成分，芯片等商品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换句话说，供应链安全风险是外部性的。正如我和另一位前财长盖特纳经常讨论的，我认为问题在于该如何把握（安全风险和其他风险之间的）界限，这依然悬而未决。关税有其合理用途，而贸易确实能为中美两国都带来巨大的利好，因此，我认为应

该实施严格的纪律，对关税加以限制，将其限制在真正需要保护供应链的领域。

但我还想补充一点。不光是美国，其他国家也一样，对于关税政策，政客往往会越过合理的界限，这是美国也是所有国家都存在的缺陷。现在，美国国内有一种观念，我不知道其是否正确，但有人认为，为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现在的政策是加大制造业投资力度，这会引发产能过剩，而过剩产能就被出口至其他国家，我并不是在讨论这件事情是否正在发生，我也不知道，这只是一种看法。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想这种做法会引起反应的。

黄益平：4月初，珍妮特·耶伦访问了我们北大国发院，她也提到了产能过剩问题。我认为，除了对政府补贴的担忧外，另一个问题是已经变为经济大国。鉴于巨大的体量，一旦我们建立一些有竞争力的产业，就会产生大国效应。当中国向

国际市场大规模出口时，就会看到全球范围内的反应。

以中国正在生产的新能源产品为例，美国和欧洲都有点担心中国的产能过剩，特别是电动汽车。5月底，我提出了一个建议，即“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它有点类似于马歇尔计划，即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实现共同成长，这反过来也有望吸收一些中国的绿色能源产能。

你认识布莱恩·迪斯吗？

罗伯特·鲁宾：我和他很熟。

黄益平：好的，他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美国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的想法，我想知道你们对这种提议的反应，即美国、中国等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并一起致力于实现这个目标，你怎么看？

罗伯特·鲁宾：我没读过布莱恩·迪斯的文 章，也没看过你的提议，益平。但不管是聚焦这个问题，还是更广泛地看，我认为，如果中美两国能设法克服对彼此的不信任、增强合作，并且承认我们在某些领域无法达成一致甚至可能会有强烈的分歧，但在许多其他领域我们可以从（合作）中受益，（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和布莱恩都提出了建议，且双方的提议很契合，这就是双方合作的巨大契机。

黄益平：也许你可以介绍我和布莱恩认识一下。

罗伯特·鲁宾：我很乐意，我明天就给他打电话。

关于创新与就业

黄益平：谢谢。我还想谈谈另一个非

常有趣的话题。我知道你很关注人工智能（AI）的发展，你觉得全球AI发展形势如何？你如何看待当前AI领域的国际格局，尤其是美国相对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位置？

罗伯特·鲁宾：正如你所知，训练AI系统需要大量资金，可以说是巨额资金。中国和美国具备这一条件，我们都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因此，我认为我们两国将继续向前发展。但除此以外（对其他国家来说），难度可能会比较大。我不知道发展中国家会怎么做，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问题。

我想我告诉过你，大约一年前，我意识到AI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于是我开始去学习相关的知识。AI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顺便说一句，AI还有助于解决美国的财政问题，因为有估算显示，AI有望提升美国的潜在增速，从当前的2%左右提高到2.5-3%，这能切

实抵消美国面临的部分财政压力。

但同时，AI 也会带来切实的风险，美国和中国必须共同努力，致力于推出某种全球性的机制。否则，中美就会陷入双边竞争之中——为了不让对方抢在前面，而降低发展的标准。

黄益平：我同意，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你刚才提到的一点也很鼓舞人心，如果 AI 真的能把美国的潜在增速从 2% 提升到 2.5%，这不仅对美国，对所有其他国家都将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不过，你听说过“索洛悖论”这个词吗？

罗伯特·鲁宾：听说过，鲍勃·索洛。

黄益平：计算机广泛普及的时候，他曾指出：“你可以在任何场合看到我们已经到了计算机时代，就是没有在生产率的统计数据当中看到任何变化”。目前，AI 仿佛无处不在，但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确

凿的证据来证明生产力、利润、收入数字在增长。你认为增长会到来吗？

罗伯特·鲁宾：对此有很多争论，我也和拉里·萨默斯讨论过这个问题，我没有确切答案，但请记住，这只是一个例子。索洛悖论有其限定的背景，即计算机的普及，但安装计算机所需的流程改变比引入AI应用所需要的流程更复杂。我并不真正了解这个问题。有些人认为（AI转化为生产率的）过程会比计算机更慢，有些人则认为会更快。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很让人印象深刻的视频片段，那是亚马逊的一个仓库，仓库里所有的搬运、各类工作都是由AI完成的，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益平。我不知道确切的答案，时间会证明一切。无论如何，不管人工智能是会发展得慢一点、还是快一点，五年以后和现在相比一定会有巨大的不同。

黄益平：是啊，我同意，我认为人工智能最终会提高生产率。还以索洛悖论为例，索洛悖论的解开，实际上是人们认识到，计算机带来的变革最终体现在生产率的数字上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其中还涉及计量问题，一些收益并没有反映在传统的经济计量中，这就是为什么要扩大计量指标。

罗伯特·鲁宾：这很有意思。

黄益平：但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麻省理工学院的达龙·阿西莫格鲁最近写的一本书——《权力与进步》，他认为，技术创新是好事，但有时也会带来结构性问题，比如导致取代一些工作岗位，但同时又无法迅速地提高生活水平。

这也让我想起了耶伦来华时说过，美国政府需要努力把就业机会重新带给小镇上的蓝领工人。这也是全球化趋势带来的

一个结构性问题，全球化是好事，但有些人被落在后面，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我猜想，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会伴随着类似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缓解结构性挑战吗？

罗伯特·鲁宾：我个人认为你说得非常对，这和贸易领域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但从美国来说，我们在劳动力的再培训、安置和社会安全网方面做得相对较差，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需要有政治意愿去做。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我认为美国拥有巨大优势，但政策调整可能会伴随着巨大的挑战，其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政治问题，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黄益平：在中国，我们也有类似的问题。在一些经济领域，技术发展非常迅速，但有时候，劳动工人被取代后能否在经济的某个领域找到新的工作，是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无法再就业，就会产生很大的社

会政治问题。

罗伯特·鲁宾：也有一点青年失业的问题？

黄益平：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需要在就业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由于一些创新会导致劳动力替代，我们需要非常谨慎地管理技术发展的过程，同时要增强再就业、再培训，并强化社会安全网建设，为失业人群提供基本生活支持等。但无论如何……

罗伯特·鲁宾：我完全同意，这些都是政治问题。我们两国都应该能够解决。

黄益平：是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共同努力。

关于中美合作

罗伯特·鲁宾：益平，我们已经讨论

这个问题很多年了。我认为两国之间存在着巨大而重要的合作机遇，也存在许多挑战。我认为合作对两国都大有裨益，我们需要认识到有些事情我们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这些问题就先搁置，在两国整体合作关系的框架内尽力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中美之间的互信确实正在流失。

黄益平：是的。很遗憾，时间到了。我们就以这个略显沉重地基调收尾吧。不过，我们还是想鼓励大家继续努力。

这是我们第五次进行这样的对话了，我以前跟你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我非常喜欢聆听你的见解、愿景和智慧，许多与会者也告诉我，这次对话是外滩峰会的一个亮点。鲍勃，我期待着今后至少再与你进行五次对话。

罗伯特·鲁宾：益平，我也期待着，但远不止五次。

黄益平：当然，保重，再次感谢。

罗伯特·鲁宾：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30th
Anniversary
1994-2024

版权

制作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制作部门：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

编选委员会

黄益平：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学院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黄卓：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南南学院副院长、
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贤青：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主任

白尧：北大国发院传播中心内容主管

顾问委员会（按姓氏拼音）

高岚（联想集团人力资源高级副总裁、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

何刚（《财经》杂志主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

刘二海（愉悦资本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刘娟（新华网副总编辑）

刘军（前美菜网CHO，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长）

吕守升（高潜咨询公司董事长、北大国发院CHO100理事）

马洪涛（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乔顺昌（茂天（北京）投资公司总裁、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唐建伟（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首席研究员、《新金融》期刊主编）

王海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长、北大国发院双学位校友）

文钊（经济观察报执行总编辑）

乌兰图雅（玲珑格致国际公关咨询CEO、北大国发院MBA校友）

武雪松（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许芳（深圳市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理事长、北大国发院CHO100联席理事长）

余兰（20年知名互联网公司营销高管、AI应用创业阶段、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张继伟（财新网总编辑、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赵雪源（北大国发院MBA校友）

周瑛锋（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北大国发院EMBA校友）

朱晓楠（GC首席人力官及投资MD、北大国发院CHO100成员）

官方微信公众号



北大国发院

*【特别声明】本资料为北大国发院编选制作的内部学习资料，
仅供参考，严禁外传。